

独立阅读

2008 年 5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阅读报告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阅读报告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阅读报告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阅读报告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阅读报告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阅读报告小组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羽良（北京）、严飞（香港）、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沈展云（广州）、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曾园（昆明）、凌越（广州）、孙骁骥（英国·谢菲尔德）、朱白（广州）、程明（济南）、罗四鸽（上海）、马庆（上海）

翻译：陈丹丹（南京）

编者按：

四月不是残酷的，但是疯狂的。越是疯狂，越是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独立阅读”希望能够成为一张书桌，我们围坐四周，静静阅读。

在这个疯狂的季节，老一辈的先生次第远去，新一代的后生尚在发育。21 年前，海子说：“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他写的是“秋”，可是也适用于 21 年后的“春”。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朱 白：写作

罗四鸽：写作

苏小和：经济

成 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言 一：艺术

追念·贾植芳、柏杨、查尔斯·蒂利

罗四鸽：先生远去，“人”字长存

王晓渔：政治犯的监狱比较学

羽 良：查尔斯·蒂利

书评

刘 柠：我跑，故我在

严 飞：陈之藩与胡适的故人旧事

马 庆：世俗时代的信仰

随笔

孙骁骥：伦敦书展：阿拉伯文学唱主角

影像

成 庆：小城里的歌声

张 昕：革命——没有电视转播

汪 伟：谎言重复一千遍还是谎言

讲演

吴 强：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晚期威权主义

译介

乔纳森·亚德利：《我的青年时代》：鲁宾斯坦迷人的前奏曲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WRITING 写作

特约撰稿人 朱白 (广州, zhubai@tom.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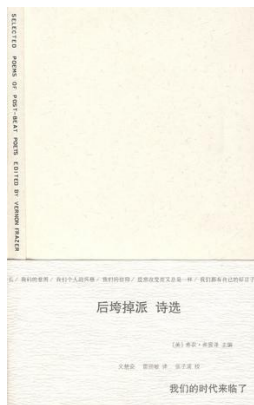
眼看着奥运就要来了,可能没人能做到真正安静地不去关注这个所谓的“大事”。正是有了太多的没什么关系又非要生出几分关系的人的关注,现在关于奥运的话题正在不断滋生。鲁迅爷早就有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今天再来看那些或气宇轩昂或愤怒青年的人们,也没离开看客的本质身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的是安全的、是从众的、是只占便宜不会有损失的事。说完没他什么事偏喜欢跟着起哄的,再说说怎么也不愿意“起哄”的。一群作家、大师应南方都市报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召唤,来到广州开会、领奖,他们可以老生常谈什么文学的力量、艺术的专利、思想的伟岸、诗歌精神的宽度,但是就是不愿意触碰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现实。这没什么好抱怨或指责的,每个人都去干自己愿意干的事,这本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可是既然大家都这样决绝地背离现实和安于保全自己了,也就别再矫情地声称和宣布那些所谓的命题了才好。

还是回到真正的阅读中,才对得起这样一份阅读报告的本意。有人宣称,看书就要看大师的书。这话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但又一次次被我们反复实践。不仅仅是因为作为读者的我们往往不能忘却“势利”,也因为在一个垃圾堆的世界实在是太容易迷失了。看书比看电视好一点,毕竟可以事先选择、判断,垃圾堆的比喻用在电视上就更准确一点。作为经典作家,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贡献不可谓不小,不是说这位大师级图书馆馆长不够世界范围的资格,只是在特殊时期(比如1980年代)对这块远离他的土地的灌溉作用实在是太巨大了。好像我们的作家也不忌讳承认自己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阴谋论地猜想,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位经典作家,受其影响至少看似安全,说不定还能提升自己作品的品位。可是,真正读过博尔赫斯的人有多少,真正读进去的人又有多少。我倒是总觉得,读博尔赫斯介绍的人要比读博尔赫斯的人多得多。当然,如果你对博尔赫斯早就开始迷恋或者根本不感冒,完全可以忽略这两本书。《博尔赫斯谈话录》([美]伯金编,王永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2月)、《博尔赫斯谈诗论艺》([加拿大]米海列司库编,陈重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不算新鲜,要知道在全集都出版很多年后的今天,关于他的书大家根本不会陌生,不是因为他有汪国真的流畅和通俗性,而是历来谈论和阐释这位大师的人太多了。包括我现在在这里罗嗦的报告,你可能过后并不会真的去读一本博尔赫斯的书。

博尔赫斯首先是一位诗人,他的功劳首先体现在诗意的叙述上。用诗意的文字写字说事儿的中国作家也有,而且不少。成都的翟永明很多年前写出过漂亮的诗歌,刚刚结集出版的《翟永明诗文集:最委婉的词》(东方出版社,2008年3月)和《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东方出版社,2008年2月)则不仅仅都是诗歌,但是她也不可能离得太远,仍然紧靠着那诗意。跟博尔赫斯的《谈艺录》一样,翟永明在《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中也用自己最熟练的语言,最大限度地讲出了她所目击的“艺术”;从绘画到装置艺术,从音乐到影像,这位女诗人用贴近自己的方式解读着她所理解的艺术。

诗人除了参与其他艺术形式或者干点别的,当然还要写诗,《后垮掉派诗选》([美]弗雷泽主编,文楚安、雷丽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就是一本纯粹的诗选,收录大多能与书名“后垮掉派”扯上关系的诗人作品。诗选中有一些早就被翻译过,也有一些称得上经典名作,只是作为一本诗选来说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都难免沾上滥竽充数的作品。要保持一部诗选的纯粹性,可能比眼前要解决中法关系还要困难一些。“一切皆可入诗”这句话在《后垮掉派诗选》中很极致地体现了出来,可以说“一切皆可入诗”是这本诗选存在的理由之一,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构成伤害一本诗选的元凶。伤与不伤,不多说了,关于诗歌历来就是求同存异,见仁见智最好了。

博尔赫斯谈诗论艺



电影刺激图书市场，这种事早就不新鲜，比如当年的《英国病人》在奥斯卡上大获全胜没几天，书店里已经摆放了小说《英国病人》。反应之迅速，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同样《赎罪》也是今年的奥斯卡大热影片，如果不是口碑太好的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赎罪》也应该是有所斩获的。估计小说版的《赎罪》（[英]麦克尤恩著，郭国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时间推迟到5月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赎罪》讲的是几个人“内心”的故事，亲人、恋人、仇人，内心世界远比他们经历的历史大事件更为波澜起伏，只不过深深的忏悔对于流逝的生命来说无济于事。麦克尤恩让我们看到一个小时候古灵精怪具有超人想像力的女作家的一生，当她在电视上公开忏悔的刹那，你知道“怎样才能获得赎罪”是个伪命题，罪已造成，无可救赎。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是个有名的“怪癖”作家，他刚出道时的作品《水泥花园》（冯涛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就是一部被反复提及的怪异之作，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生性怪癖，做离谱的事、说更离谱的话，他和自己的姐姐、妹妹、弟弟四人用水泥埋藏母亲，他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巨大花园里，最后抵达一场乱伦的高潮。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在麦克尤恩平实的讲述下充满魅力，以至于这么多年来一直有批评家反复阐释。关于麦克尤恩应该不让人感到陌生，他最著名的小说除了《水泥花园》之外就是《阿姆斯特丹》（王义国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2月），这是一部获布克奖的作品，为麦克尤恩赢得巨大名声。再加上充满形式感的《时间中的孩子》（何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如果对这位以怪异故事打动人心的作家有兴趣，可以一下子找出几乎他全部的中文版代表作。



跟大众艺术形成联系而出版的图书，比如话剧之后的剧本。说到话剧，个人觉得最扯淡、最优雅都集中在这个古老的艺术形式上。国内著名话剧编剧廖一梅曾经愤怒地说过，大众审美就是臭狗屎，但没有人能真正离开大众审美，更何况作为话剧导演妻子和话剧编剧的她。话剧导演孟京辉拍过精彩的话剧，也拍出过臭狗屎般的电影，这一点不奇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创造的艺术更不可能是完美的，甚至趋于完美都是极其少数的。孟京辉的精彩话剧就包括《恋爱的犀牛》，精彩之处在于它能把你从矫情中拔出来再投入更加矫情的叙述中，也就是说孟京辉很好地利用了话剧这种表达形式。可话剧变成剧本出版，就不会那么好看了，因为形式感完全消失了。我的意思是除非你看过话剧版的，想重温某种体验，就可以再翻开《琥珀+恋爱的犀牛》（廖一梅，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廖一梅用“话剧语言”写成的长篇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虽然刻画一个很大很大的绝望，但我觉得这种夸张和矫情还是更适合改编成话剧，作为小说，我没觉得它成功了。

最后将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吴正仪译，2008年2月）、《命运交叉的城堡》（张必译，2008年2月）、《美国讲稿》（萧天佑译，2008年2月）放在这里，算不上“报告”，只是给那些喜欢卡翁的读者提个醒，译林出版社继续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他的作品。赘言一句，近日重读卡尔维诺的《烟云》时，感到非常寓意——在广州整日整日的灰霾天气下，一边呼吸着灰霾中的空气，一边不安地看着50年前的这部《烟云》……很多重叠让人惊讶。你知道，人类不是在今天才需要学会面对我们自己造成的危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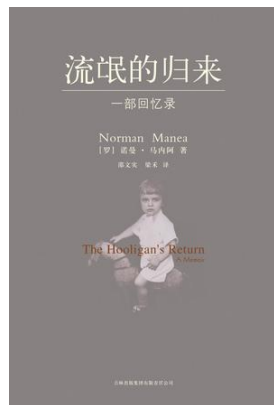
WRITING 写作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鸩（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2008年的春天是沉重的。2月，耿庸去世。3月，彭燕郊去世。4月24日18时45分，就在我提笔写这份阅读报告时，又一位上个世纪的老人——贾植芳先生离我们远去，一个时代渐行渐远。

第二天，我在复旦大学看到了贾植芳先生的讣告，短短几行字介绍了中文系退休教授贾植芳的一生，相比之下，校园内挂起的千纸鹤似乎更能说明贾植芳先生狱里狱外的一生。贾植芳先生在他的回忆录《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中感叹：“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永远也摆脱不掉政治情结这只‘红舞鞋’。”而他的一生，先后四次因政治原因入狱（1936 年、1945 年、1947 年和 1955 年），从民族战争到政治运动，从“危害民国的囚犯”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20 世纪中华民族的每一场浩劫他都赶上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然先生言：“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灭。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如今，似乎只能在泛黄的书上体会到贾植芳他们那一代人的铮铮血骨与理想之光。



贾植芳先生有两枚闲章：“洪宪生人”、“秦坑余民”，1936 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诺曼·马内阿却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1941 年，5 岁的他与全家人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一个集中营，但他活到了德国战败，死里逃生返回罗马尼亚。马内阿在回忆录《流氓的归来》（邵文实、梁禾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 3 月）中，对这段恐怖的经历写道：“1945 年 4 月，我是个 9 岁的老男人”。

第一次归来后的马内阿以无比的激情拥抱当时普遍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然而，在目睹了日益不公的专制以及对自己父亲的错误羁押后，马内阿逐渐对齐奥塞斯库政权失去了幻想，1986 年，50 岁的他再次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罗马尼亚，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

对此，一位罗马尼亚女诗人对他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得生活在这里，我们要在自己语言环境里，坚持到最后”。

马内阿回答：“但是为了写作，我们先得活着。坟地里满是不能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下来了，在坟墓里，他们不再能写了”。

虽然马内阿认为，流亡不是最好的选择。除了内心的流亡，只要是流亡，都应尽一切可能去避免。离开你的国家、家庭、朋友、书，还有你的文化和根基，只能是一种最后的、绝望的、终极的办法。但在坚持与流亡之间，马内阿选择了流亡。在流亡前夜，马内阿对自己说：“实际上，所有幸存者在适应的都是生活，无论他们是黑色、绿色或红色专政的幸存者。他们这么做了，以不合理的常态，而这种常态就是生活本身”。

诗人北岛曾说，在外漂泊，中文是唯一的行李。在英语的世界中，在远方，幸存者马内阿坚持用罗马尼亚文继续自己的创作。

1997 年春天，流亡 10 年后的马内阿第二次重返罗马尼亚，对自己的祖国进行了为期 12 天的访问。那一天是 4 月 20 日，碰巧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然而重返祖国后，他发现“在抵达了这个直到有一天为止一直是‘家’的地方，我却想念我留在身后的那些东西，在美国的那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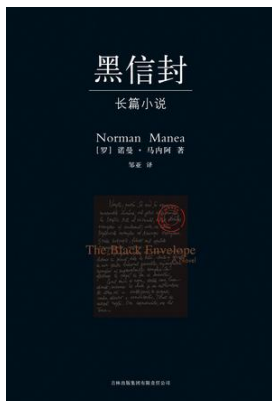
在《流氓的归来》中，马内阿带着复杂而细腻的情感，记录了自己的这两次归来，回忆了自己一生的荒谬历程：从集中营归来的少年到意气风发的水电工程师；从孤独绝望的作家到自由漂泊的流亡者，并“在太迟的九年之后，我终于出现在我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我祖国的葬礼上。”最后，他回到了他流亡生活的最后庇护所，地址是在纽约，上西区，曼哈顿。

在罗马尼亚的文化和历史中，“流氓”一词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它意指被放逐者、局外人、孤独的人、独立的思想者。更能体现马内阿的“流氓”习性的是他的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章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 4 月）。如一位读者所言，这本诅咒极权主义的评论集能够在国内翻译出版，简直是个奇迹。这本评论集写于流亡之初，1992 年以英译本率先在美国出版，一共包括《罗马尼亚》、《论小丑》、《审查者报告》、《幸运的罪》、《一个访谈的故事》五篇文章，关注的都是作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马内阿“极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政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但却“希望讨论作家、权力和那些并不无辜的被压迫民众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作家和他自身弱点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些愿意受极权主义乌托邦愚弄的人所犯下的罪（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并不是默塞·伊利亚德所认为的那种幸运的罪，那些因每日参与权力阴谋受赏得到的搞笑面具引来的不仅仅是笑声”。



虽然，马内阿的观点带有他个人独特的经历，或许偏颇，但这位“流氓”的讨论确实振聋发聩。如开篇第一页他写到：“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

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特别是要保护自己不陷入那些精神陷阱，不受到那些简单化观点的侵蚀，它们不仅仅存在于极权制度里，而是无处不在”。



长篇小说《黑信封》（邹亚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 4 月）是此次面世的马内阿文集三本中唯一一本文学作品，虽然已经在我的书桌上放了两个星期，但我仍没看完，原因是最可信也是最不可信的那个：忙。因此，只能借用小说封面上的文字做两句话的介绍：这是一个“非正常人”叙述的故事，充满了迷乱、隐喻和梦呓。全书由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场景构成，组成了一幅令人震撼的 20 世纪 80 年代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风貌图卷。

在《黑信封》的封底有这么一行广告词：“《黑信封》可能是马内阿最好的文学作品。”不过，让我更感兴趣的却是《黑信封》最初出版时的一段八卦。这部小说 1986 年首次出版于罗马尼亚，然而却经历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论小丑》所收的《审查者报告》一文中，记录这场荒谬的战斗：他们不断“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或是某个单词和他们争执”。在文中，马内阿附录了一份长达 12 页的当时审查者的报告。报告对于小说主题、人物、场景、语言等提出都作了详细的评判，并拉了一个长长的修改清单，指令作者删去部分章节和“过于嘲弄怪诞的评论”，其中仅要求被删除的日常生活负面现象就有 12 条，如关于街道、泥泞、垃圾、黑暗、队伍、商品紧缺、疲倦而野蛮的人和混乱的描写；缩减关于精神病院里少年酗酒的章节；关于由于经济原因缩短残疾人受教育时间的法律等等。此外，还要求作者“加入一些正面肯定的文字”，以“美丽的春日”来突出首都的“明媚和充满生机”。虽然，三易其稿后，作品终于出版，但这份报告却唤起马内阿内心深处关于集中营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可怕回忆。1986 年 12 月，他终于借出访之机在外滞留不归，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罗马尼亚文学被迫在隐蔽而机敏的符号中寻找避难所，以含糊不明的形式生存下来。”我想，如果对照这份审查报告读《黑信封》一定生趣盎然，这让我极其盼望五一假期的到来。虽然，我总是怀疑在 21 世纪的春日里，读 20 世纪的书看 20 世纪的故事是否过于沉重，是否还合时宜？

不管怎样，还是应该多听听老人的话。因此再介绍一本书：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聆听父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 月）。张大春被称为台湾文坛的“顽童”，而写这本《聆听父亲》的张大春却像一位饱经风霜满怀忧虑的老人。这部小说，或如作者本人所说，更像长篇散文，以父亲的一次意外摔倒瘫痪为契机，为自己即将出世的儿子讲述父亲与父亲的父亲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大时代中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然而，“你要问我，‘大时代’是什么意思，我就会用我父亲的话告诉你：‘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因此，认为张大春是在说一个家族的故事，似乎又是肤浅的。在张大春杂芜肆意的叙述中，他想告诉我们的远不止是一个故事，因为小说中让我停留、再三咀嚼不是故事，而是那些看似荒谬的文字。可这部书到底好在哪里？我也说不清楚。那种感觉就犹如小说开头那位孩子的话：“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我无法对小孩子说出的充满智慧的话进行中心思想归纳。不过，能让人再三咀嚼的东西应该是个好东西。



放下笔，有些茫然，因为明天（4 月 29 日）要去参加贾植芳先生的追悼会，不由想起一位老师告诉我的贾先生的一个笑话。有人问他，现在您的最大心愿是什么？贾先生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活着参加我的追悼会。一个我躺在棺材里，一个我站在第一排，听听别人给我的悼词，看看众人的表演……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整个 4 月我都沉不下来好好读书，一方面，目前公开出版的经济类图书的确乏善可陈，另一方面这个国家一直笼罩在

某种原始的冲动之中，而我又想通过个人阅读找到这种群体性盲动的深层原因。所谓四顾两茫茫，我的个人心绪竟然是两边不讨好。



在一堆廉价的情绪之中，我终于发现了一本融合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学方法为一体的好书，这就是美国学者何伟亚的《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何亚伟是我熟悉的汉学家，我曾经读过先生的另外一本书：《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从材料的角度前所未有的看到了一个专制国家因为缺乏宽阔的视野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窘境。而国内学者茅海建的《苦命天子》（三联书店，2006年1月）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度史料挖掘，让我对这个国家忍不住反复叹息。

不过出版社为这本书制作的内容简介却别有情趣：“本书把中国嵌入到19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之中，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仅是枪炮、商品和各种侵略行为，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一个需要被征服人民自愿去接受的‘霸权工程’”。这样的表述最大的问题在于强迫那些没有读书经验的读者必须接受某种主流意识形态路径，将近代史的中国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置于一种对立关系中。出版者甚至可能有一个意图，似乎要将何伟亚的著作打造成某种爱国主义的教材。但事实上何先生的写作目的却高远很多。比如他在第一部分的第二章详细陈述了“中国的暴力与法治”，毫不客气的还原了清朝落后的国家治理模型。不过，我思考的重点并不在这里，而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些史料完全不知道，在信息的层面出现了巨大的盲区。如此，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完全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前提下，多年来一直非理性的鼓动仇恨心态，张扬爱国主义激情，并把爱国主义当成了我们思考和生活的惟一出发点。就像此时此刻，这个国家无数的人们正在爱国主义的激情中亢奋，他们一分为二，在网络上出口伤人，又成群结队，在警察的监督下去家乐福抗议，或者是跑到CNN的门口扯起五星红旗。如果不是存在恐惧心理，估计他们已经走到长安街上奔走呼号了。我曾经和几个热血青年做过沟通，发现完全无法和他们展开辩论，爱国主义成了是与非、对与错、敌人和自己的绝对分水岭。

可惜历史并没有如此简单。我看到历史里的慈禧首先以爱国主义的名义鼓动义和团杀人，然后又以国家的名义将义和团剿灭，爱国主义成为专制统治者所欲为的工具，也成为义和团的死亡地带。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义和团会有如此悲惨的结果。很多人将他们的行为视为愚昧，但事实上几乎所有义和团的成员都曾经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在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层面，每一个义和团成员都不会比我们更愚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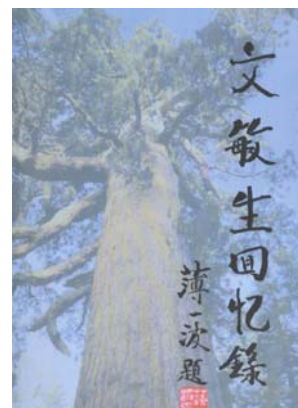
如何看待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留给我们的历史感，一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何伟亚的系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视角，学者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更认为，“乾隆时期中英两国的冲突不是单纯的国务冲突，而是两个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和封建主义时代）、两类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冲突，其中尽管带有民族冲突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为当时英国的战略意图主要不是军事侵略，而是用和平手段扩大经济利益”。美国人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的新著《贸易打造的世界》（如果出版社，2007年12月）则站在世界的角度，呈现了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已经彻底改变人类的文明解构，贸易是当下世界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而不是此前的战争性吞并。我们看到，当年清朝政府和英国时节的外交失败，却是在是否按照常规朝贡方式行三跪九叩礼仪上存在争执，而不是一开始就火烧了圆明园。

现在，我们可能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究竟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是伪造的历史？

感谢著名传媒人周志兴先生，我从他那里读到了几本自费印刷的好书，在这个自我审查无所不在的年代，我私下认为，这些书传递出来的信息可能才会被以后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真正关注。

首先是文敏生(1915.10-1997)写的《文敏生回忆录》，文是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还担任过邮电部部长。令人不解的是，这本有革命元老薄一波题签的回忆录，不知为何还要自费印行？

这本回忆录说，1961年2月，正值河南遭遇到极其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调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文敏生到河南工作，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河南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我们在文的回忆录里看到，五十年前人民公社的红旗首先从河南升起。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成都会议”决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迅速贯彻这一精神，马上在河南寻觅试点。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嵎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并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一步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试验。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左”倾思想带来的“高指标”、“瞎指挥”、“反瞒产”、“浮夸风”，一年时间不到，河南就经历了从“共产风”到大饥荒的大起大落。

文写道，大办人民公社，河南是闻风而动，一哄而起，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特点叫“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大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会并成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在全社范围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同时，连农民的自留地、果树、家畜也都被收归社有，这种对农民的种种剥夺，引发农民的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人民公社还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来从事工农业生产，为此采取了并大村的措施，即集中居住、男女分居、吃大食堂，使群众的房屋也遭到极大破坏。作者举“浮夸风”一例，为了完成夸大的棉花产量，向上面报喜，甚至把群众的棉被套中的棉花和棉衣中的棉花都挖了去，使群众过冬都成了严重问题。而闻名全国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1959年秋，信阳地区的粮食实际产量为16亿公斤，却被高估为32亿公斤，分配征购任务4.8亿公斤，却被层层加码到5.2亿公斤。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信阳地区开展了残酷的“反瞒产私分”，使一些县仅剩下二三个月的口粮。本来粮食就不够吃，为了掩盖“浮夸风”的错误，还倒行逆施，采取了“不准解散食堂，不准家里点火冒烟（社员自己做饭），不准外出逃荒，不准向上反映情况”等高压政策，造成全区18个县（市）中，大约1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一事件震动全国，中共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来河南检查工作，曾严厉批评河南主要负责人说：“你们只怕资本主义，就不怕浮肿病、饿死人！”

“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文敏生书中有统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1959年，河南的粮、棉、油产量分别比1958年减产29亿、2861万公斤和5759万公斤。到1960年，全省普遍大旱，98个县受灾，面积达1亿亩以上，受灾人口2800万，占全省4848万总人口的58%，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又下降11%，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61万。到了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50亿公斤，减产40%，相当于1949年的水平，许多地方的群众一天只能吃到半斤粮，被群众称为“晒太阳粮”，全省1500万农村劳动力，竟有600万病人，不能参加田间生产。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当年公共食堂的建立，曾一度使不少人幻想进入了“吃饭不要钱”的乌托邦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口粮的大食堂，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接踵而至的粮食危机，则给予了农民更沉重的打击。从一开始号召宣传的“放开肚皮吃”，到后来的一天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汤，有人想在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连一口锅也没有，因为早被砸碎炼了废钢。书中记载，作者上任的第三天，就深入到重灾区原阳、封丘、延津等地调查，出郑州不远，就看到白糊糊的盐碱地，一片凄凉，许多群众都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骨瘦如柴，卧病在床，肝炎、浮肿病到处蔓延。有人把当时的情境比喻说：“牲畜站立靠人抬，人拉犁耙腿浮肿。”如延津县新乡屯生产队，人口1400多人，劳动力只有200多人，能出勤干活的只剩下50多人。群众反映的集中问题就是：公共食堂伙食差，吃不饱；有些地方公共食堂缺柴严重，问题比较大；农民

要求回家做饭，而干部不敢搞，怕犯右倾。作者在一个公共食堂看到，只有一口锅，锅一坏，群众就吃不上饭；蒸笼也是一个，还是破的，外面糊了很多泥巴，一个小队百十口人吃饭，居然连个案板也没有。

另外一本有意思的书，是张策（1911—1999）的自印本《我的坎坷一生》，张曾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在回忆中自陈一生中曾两次执行过“左倾”错误，但也遭受“左倾”路线的多次深重迫害，五次被株连，所以有责任对自己的一生做个彻底回顾，这对党的某些历史是非可能是有益的。作者认为：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客观存在，写历史的人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些历史重大问题绝不能回避，对自己的错误更不能隐瞒，对亲者尊者都也不能避讳。否则，说一大堆不着边际的空话假话是毫无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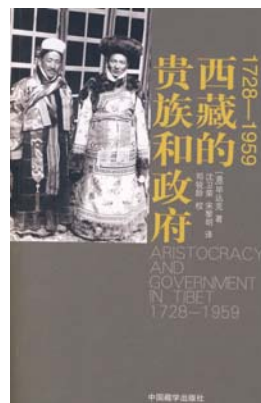
张策是1958年3月下旬，正值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时候，被派往陕西省任省委书记兼西



文敏生的书主要叙述了人民公社大食堂时代的遭遇，张策则主要记录了大炼钢铁的种种荒谬。如此惊人的悲剧，当年就是在国家主义的强大鼓动下上演的。今天来看，我们会认为当年的中国人普遍失去了起码的智力判断，但是在当年，这一切却是理直气壮，压倒一切。我不愿意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对这些历史进行反思，宁愿相信那只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学错误。只是这种种错误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失彻底而消失，它们仍然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一次又一次重复上演，让那些了解历史了解经济学的人们彻底无语。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要了解西藏的历史恩怨，国内好的研究并不太多，大多都只限于粗略介绍。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当算个中名著，其实他还有一本介绍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精要之作《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杨和晋译，明镜出版社，2005年）也相当精彩，可惜此书目前只在香港出版。简言之，按照戈尔斯坦的观点，西藏与中国的关系由于历史沿革，已成定局，难以回逆，唯有双方耐心的对话与政治智慧方有解决之道。





反观晚清王朝时期的汉文化，同样面临西方现代化的挑战。从魏默深的“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的如火如荼，儒家的道德伦理饱受西方理念的冲击，最后演变成张之洞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二分法。这种“理”与“势”的冲突最终以“势涨理消”而结束，但是历史能否用成王败寇的逻辑解释？最近杨国强出版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年4月）则以相当怀疑的态度来审视所谓现代化的成功史。尤让人拍案的是，杨国强先生有相当多的历史考证来说明，当年许多“空谈心性”的士大夫，尽管广为后世诟病，但是却极富有以“理”抗“势”的儒家精神，在今日这种扭曲的现代化结果的映射下，这种气节却是难以再觅，折射出历史的悲情。

值得一提的是，杨国强先生虽然名不昭于公众，但是却是极富史感的晚清史学家，笔者也有幸聆听其课，极为受教。正如他夫子自道，他以宋学精神作为历史阐释的依据，而反对现代化、后现代史学的基本假设。如此看来，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义理”一路，今天仍有薪传。

同样是分析转型时代，日前萧功秦先生也出版了《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此书虽然基本沿袭了作者在1990年代为人熟知的新权威主义观点，但是在许多方面都有细化与展开，对于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也有更为清晰的阐明。尽管读者对其分析可能会有异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知识分子，萧功秦在这20余年的学院知识生产转型过程中，仍然沿袭着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并且以真诚的态度面对这个社会的历史变迁，这让他的文章少了许多学院知识分子的匠气，也折射出他身上那种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所应善存的一些理想主义。

除了萧功秦先生的新保守主义，今天中国逐渐又有一股新的“保守主义思潮”。大体而言，这一思潮所保之物，乃是政治上的所谓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遗产”，在文化上则以儒家文化作为立命之基，两股合一，可称为“儒家社会主义”。这种结合的趋势如今已日见明显，许多往日的“左派”开始纷纷与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结盟，也是颇为怪异的思潮动向。

对于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李零先生有过相当多的批评，认为今日之所谓文化复兴，都是想恢复所谓的道统与政统，是一种倒退的迷思。继去年广受争议的《丧家狗》之后，李零最近又推出两本新书，《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三联书店，2008年3月）与《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三联书店，2008年3月），后者依然延续着他将孔子去圣化的思路，在举世读经的浪潮中，如此声音就算对此异议，也不可不容。



如何理解传统，自然是每个文明的重要议题。霍布斯也就是在批判基督教的前提下来展开他的新政治科学的，最近出版的《〈利维坦〉附录》（赵雪纲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3月）是霍布斯研究一份重要材料，让我们重新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面对基督教传统，并且将其进行转化与改造。所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莫过于此了。

关于基督教史，笔者最近一直在翻阅由北京大学推出的“基督教文化译丛”，由于都是直接从英美神学研究专家移译而来，而且作为通论，大多都相当不错。日前与隔壁一位历史系老教授聊起了华东师大当年的徐怀启先生，他早年在圣约翰大学执教，作为基督徒，长期担任中华圣公会会长，是国内少有的基督教史研究的权威。但由于政治运动，导致毕生所学难以施展，晚年所计划的《基督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也只完成第一卷，让人唏嘘。

朱维之先生也是老一代学者的代表，最近他的《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3月）又有新印，而距离最早付梓出版的时间，已是19年前了。或许继承传统，有时候并非是武断地抛弃前人，自认为能够以一代之力跨越时空，与“圣人”相遇，那种心态，或许也是一种“妄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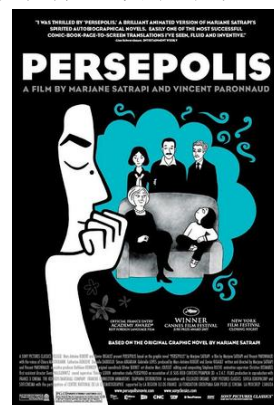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由于奥运会严防死守,兴奋剂全部流落民间,我们突然变得亢奋起来。想在满目热血青年中寻找几只冷血动物,异常困难,只能在博客里发现一些幸存者,追溯他们的精神资源,跟“独立阅读”的取向基本一致,看来阅读不是毫无意义的。在兴奋剂时代,阅读就像给自己注射疫苗,只有这样才能自救。我并不讨厌热血青年,可是冷血动物同样有存在的权利。

在这里,我愿意推荐两篇历史悠久的小说,一篇是郁达夫的《沉沦》(1921年),另一篇是茅盾的《林家铺子》(1932年)。《沉沦》里的“他”是一个海外留学生、一个患着忧郁症的文学青年,总觉得同学在背后怀着恶意看他,整日暗自想:“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正值青春期的他,同时面临性苦闷和种族歧视(小说暗示这种歧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过敏的想象),只能以偷窥、买春的形式发泄利比多,但这又给他带来负罪感,最后蹈海自尽。临死前,他发出三声呼唤:“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三声呼唤得到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被定性为爱国主义的呼唤。但我总觉得,虽然郁达夫在二战中成为烈士,却难以把《沉沦》里的“他”也追认为烈士。

关于海外留学生的描写,不只是《沉沦》模式。最近看了法国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又名《茉莉人生》),它充分呈现了一个伊朗少女的两难处境:你留在国内,缺乏自由;你离开祖国,却会失去自己的根。故乡和异域,都有着致命的诱惑和漩涡,一个人不能同时生活在两个空间里,如果你没有选择,也就算了,如果你可以选择,可以来回迁徙,反而更加难以定夺,你会享受到两种不同的诱惑,也会被两种漩涡裹挟。这个伊朗少女像是站在两块吸铁石之间的钉子,几乎被撕裂,这种与肉身经验密切相关的内心撕裂不是我们熟知的那种海外爱国留学生的分裂,后者生活在异域、然后歌颂故乡,异域满足生活需求、故乡满足精神需求,两者通吃。这部动画片改编自玛赞·莎塔碧的4卷自传体《我在伊朗长大》(三联书店,2006年),喜欢这套绘本的读者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动画片,反之亦然。



她在伊朗长大,我们在中国长大,我们需要熟悉自己的历史。林家铺子因为销售东洋货遭到抵制,可是镇上销售东洋货的商铺比比皆是,党部只要接受贿赂,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群众的意志没有想象得那么坚决,商品只需撕去东洋标签就会照样购买,正好林家铺子进行打折促销,何乐而不为?“独立阅读”曾经一笔带过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这个春天尤其值得细读。葛凯先生讨论了国货运动中的很多困境,比如如何区分国货和洋货,这就是一个难题。南京国民政府曾经制定一个详细的标准,把国货分为七个等级,在现实中,公众无暇进行这种化学分析式的鉴别,而是根据自己精密的利益计算决定抵制什么、支持什么。



以上介绍的都不是新书,但是它们作为兴奋剂时代的疫苗,至今没有过期。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重温这段历史(尤其是1989年以前的历史)可以预防闭关锁国的思维春风吹又生,《袁庚传》(作家出版社,2008年3月)就是最好的疫苗。其中有个细节很有意思,袁庚刚到香港招商局就拉着下属去电影院看风月片,看了一半,袁庚起身就走,出门后对下属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也就是这样子!”当时党政干部因为看三级片受到处分,不是少数,袁庚却说,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才能批评。他还从电影院的观众多是老人分析出风月片除了迎合少部分观众不健康心理,也符合老年观众的生理需要,甚至后来还带上招商局几个老头一同去观看。相比之下,直到2002年8月,陕西省延安市还有夫妻因为在家看黄碟被民警骚扰,两者的观念相差至少20年以上。在我看来,《袁庚传》还嫌不够,应该还有《万里传》、《项南传》等等,形成一套“改革开放列传”。《袁庚传》作者涂俏为了写作传记辞去工作,3年追访156人,这让我想起撰写何兆武口述自传的文靖,这种记者多多益善。

莫里斯·迪克斯坦先生的《伊甸园之门》曾经影响中国的一代文艺青年，这本《途中的镜子》（刘玉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 4 月）不太可能再产生这种轰动效应，这不是它的原因，而是时代变了。兴奋剂时代只需要《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年）、《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 年），只需要《环球时报》。迪克斯坦从《红与黑》第 13 章引言中的一句话“小说是携带着上路的一面镜子”出发，重新打量现实主义。当然，他无意于发明“底层写作”或者“打工诗歌”这种僵硬的概念，司汤达镜子里的世界不是静止的，而是晃动的。迪克斯坦的文字一如既往地具有非他莫属的文体特色，阅读一本理论著作也能拥有快感，可遇而不可求。在欧美作者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本雅明、桑塔格、罗兰·巴特，等等。但在中国作者中，就非常稀少了，朱大可先生是一个例外。他的《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年 1 月）难以归类，是创作，还是理论？



这提醒我们，理论本来应该就是创作的一部分，是现代的分类制度把两者割裂。《记忆的红皮书》修复了这个裂痕，其中同名专辑最为值得注意，我觉得可以把它放置到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北岛的《失败之书》和《青灯》、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和《伶人往事》甚至是曼德尔施塔姆的《第四散文》、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这个谱系里。我与作者供职于同一个研究所，我愿意冒着被指责为“表扬家”之嫌推荐这本书。《途中的镜子》和《记忆的红皮书》都以文体见长，朱大可的话语一向有“朱语”之称。顺便说一句，我对热血青年的不满，主要不在于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话语方式。我可以容忍不同观点，但拒不接受那种充满仇恨的话语暴力。



我一向喜欢看日记和书信，但集中关注的是民国时期，偶尔看一下当代的，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在《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花城出版社，2008 年 1 月）里，我看到他与肖瀚先生的通信，后者应该就是在“杨帆门”事件中辞职的肖瀚兄。史铁生先生写道：“在不产生昆德拉的土地上，别指望产生哈维尔。在没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为信仰而死的还有两种：‘肉弹’和叛徒。”妙极，这句话很适合作疫苗。他还写道：“诚实真是不容易做到。我所以佩服王朔，就因为他敢于诚实地违背众意。他的很多话其实我也在心里说过，但没敢公开。”史铁生和王朔，在评论家那里经常被放置在两端，一个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表，一个被视为犬儒主义甚至痞子文学的代言人。长期以来，我出于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敬畏，对史铁生的著作也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看了这封通信，我立即感受到史铁生的可爱。一个与王朔有共通之处的史铁生，要比那个与王朔针锋相对的史铁生，更值得认真对待。同样，一个被史铁生接纳的王朔，要比与史铁生对立的王朔，更接近王朔。这样说有点像绕口令，希望诸位没有绕晕，理解万岁。

最后推荐一本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宋碧云译，新星出版社，2008 年 2 月）。迪克斯坦说：“我们应该视奥威尔为伟大的作家，还是仅仅属于一个时代的作家？”同样，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视钱德勒为伟大的作家，还是伟大的侦探小说作家？”暂且不提他非常擅长设置的侦探机关，单单“语气冷淡得连一片意式冰淇淋放她身上都化不掉了”、“声音听起来就像不锈钢”这种雕虫小技，就足以让我一边读着《漫长的告别》，一边考虑着要把他的其他小说都搜罗过来。这个时代一会像集体服用了兴奋剂，一会连露天的冰激凌都化不掉，看来还是阅读比较可靠，至少可以自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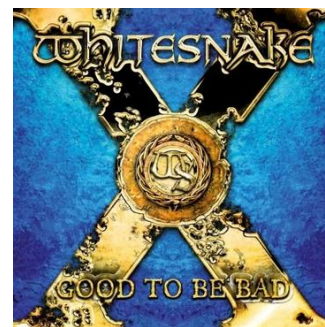
ARTS 艺术

观察员 言一（成都，richard7briner@gmail.com）

不知道是不是我身上潜藏的乌鸦嘴能力发挥了作用，四月一不小心真的成为了一个让我应接不暇的月份。然而，也许是由于天性淡漠，那 msn 上的一片红心竟对我没有丝毫的感染作用；一个深呼吸之后，我还是抖擞了下精神，义无反顾地迎向了那些扑面而来的音乐达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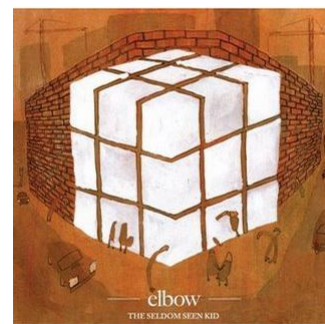
若是真算起来，选在 3-4 月发布作品的大牌音乐人实在是不少，只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历年精选。比如久违了的 Dream Theater，比如刚出了传记电影《Control》的 Joy Division，也还有几乎快被人遗忘的 The Who。其中，Joy Division 的精选看上去确实像是唱片公司的骗钱行为，而久石让的《Piano Stories Best 88-08》更让人觉得有为他音乐会造势的嫌疑；可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当我听见 The Who 那首经典之作《Who are you》时的感动。大抵，像这样令人听来有恍如隔世之感的音乐精选，往往是我心头的最爱。

或许是在不经意间继承了 The Who 那怀旧的调子，我惊喜地听到 Whitesnake 重又在《Good to Be Bad》里乘着高亢的吉他开始咆哮，听到 James 在 7 年之后裹挟着八十年代的曼城之声翩然而至。时光倒流 20 年。彼时的美国音乐界，三分之一是重金属的天下；而 James 则在 Tim Booth 的带领下，延续着 The Stone Rose 和 The Smiths 创出的属于曼城的辉煌。巧的是，Whitesnake 终究被 1990 年代的 grunge 浪潮淹没，而 James 也在 brit-pop 兴起的同时黯然退场，把风头都留给了 Blur，Oasis 还有神鬼莫测的 Radiohead。如果说他们之前的同步离开尚是潮流变幻之不可抗的话，那么当下的同步归来却更显得像一个莫大的巧合。并且，在我看来，这样巧合在冥冥中还有个坚硬的内核：他们的音乐都历经岁月却分毫未变。于是，当 James 的《Hey Ya》响起之时，我恍惚记起那个翻来覆去聆听《Pleased to meet you》的夏天的味道。



记得在之前的报告里曾写过，Radiohead 去年首创的网络发行唱片几乎成为了唱片工业变革的代名词。然而，工业音乐巨头 NIN(Nine Inch Nails)的主唱 Trent Reznor 对 Radiohead 的做法却颇有微词，声称 Radiohead 只提供低音质的 mp3 下载这一做法不太地道。于是，等到自己发行新专辑《Ghosts I - IV》时便事无巨细地提供了最全面的细分产品，比如供免费下载的高品质音乐，封面内页图片，不免费的黑胶唱片与限量套装，一口气将由 Radiohead 开了头的唱片网络发行进行到底。然而，一旦回到音乐，你会发现，对于 NIN 而言，变化的不仅仅是唱片的发行方式，更是他们的音乐本身。新专辑的前两首便十分难得地在噪音的铺陈中用钢琴点缀出一片空灵，若不是事先有知，搞不好会把 NIN 误以为成 Sigur Ros；等到第三首却又急转直下，进入民族风纷呈的电子世界，再到后来，你还会遭遇到那些在后摇乐队中常见的乐器，比如班卓琴，当然也少不了 NIN 招牌性的工业噪音。一路听下来，专辑内 36 首作品都是纯器乐作品，不见人声；而其乐风的纷繁多变更是与之前的 NIN 判若两人。真不知 NIN 是否会就此跨入实验的领域。

同样显著的变化也出现在 Portishead，Elbow 与 Moby 这三位我十分喜爱的音乐人身上。说起来，Portishead 的新专辑让人等待的揪心程度比起望穿秋水一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唱片发出之后，不少乐迷却大为失望。原因在于，那股原本湍急纯粹的黑色潜流竟被新加入的电音搅得模糊起来，而暗黑女王的声线亦开始透出几分柔软与暖色。可是这毕竟不是那种甜点般的 trip-pop，Beth 的声线在变得轻柔的同时也在上面敷上了见血封喉的毒药。黑色的潜流依然存在，并且还在搅动中变成了漩涡，只等着那吹弹即破的暖色在不经意间被碎裂，落下，进至沉沦。相比之下，Elbow 的《The Seldom Seen Kid》听起来就像是和 Portishead 反其道而行之。以前 Elbow 音乐里那些华丽流畅的元素开始慢慢褪去，如同遭受了空气的腐蚀，进而露出一些坚实，有力的构架。对此，那些依旧沉迷于他们之前所营造的绚丽当中的乐迷自然也是不满意的。至于 Moby，还真是像袁智聪先生说的那样，在《Hottle》当中玩了一把清澈之后，又一次回归到大杂烩大融合当中——Techno / House / Breakbeat / Hip-pop / Gospel / Blues 一个不少，继续当起他的音乐顽童来。



即便如此，那些发片的大牌音乐人也还是没被我数完的。首当其冲的便是跨界大师 John Zorn 的新作《The Dreamers》。这是一张单看封面很容易被判为小清新的作品，可是既然是 John Zorn 的作品，你自然也应该知道应该期待的是什么，也知道难以预测的是什么。而我却是实实在在的被高科技拖累——搞不定 fs2you 的那个劳什子软件——愣是无法下载这张新专辑，亦无法评论。值得一提的，自然还有 Van Morrison 老爷子的《Keep it simple》。人到了范老爷子这把年纪自然是有能力化繁为简了。然而不管是繁是简，在老爷子举手投足之间却总也脱不出那股化不去的爵士蓝调味道。我暗自揣测，这大约和范老太爷喜欢收藏爵士蓝调唱片有关。

尽管知名度不比前面两位，Children of Bodom 却是旋律死亡金属中的大牌，其原盘在打口市场上一度被炒上一百。可



他们这张名为《Blooddrunk》的专辑在我听来却是中规中矩，无甚新意，一听即过。也不知是真的毫无进步，还是我心性已变。而高中时喜爱过的流行天后 Mariah Carey 亦可谓来势汹汹，竟把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当作了专辑名。一听之下，却是地道 R&B，尚且悦耳，却再无法打动我心。也许，《Hero》一曲就此终成绝响也未可知。反观流行朋克大牌 Anti-Flag，倒是盛名之下，名副其实，其新专辑《The Bright Lights of America》依旧保持了那种让人血脉偾张的速度与激情，足以让人听它个酣畅淋漓。这样的音乐若在开始工作时听听，实有提神之妙用；可若是在出门抵制之前，那还是听听 Van Morrison 的好。

虽说有如此多的美妙音乐在大多数时候填满了我的耳朵，可是却依然挡不住那蓬勃的爱国热情裹着对于外电报道失实的义愤填膺呼啸而来。诚然，外电确实对我们，对全球人民不尽不实；可是我们的内电又何时对我们知无不言过。某种意义上，波兰电影大师瓦依达的新作《卡特惨案》正是对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简单粗暴的二元思维模式的解毒剂。在影片中，同样是为了维护自身在波兰的统治，你将看到德国人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将卡特惨案作为攻击苏联的宣传武器，也将看到在二战胜利之后苏联又是如何用高压政策将自己犯下的罪恶一并算到德国人头上。媒体抑或宣传，从来都不是公正无偏的；而战争状态下的宣传战则正是对媒体这一本质的极端放大。影片中，某波兰将军被处决的噩耗传来，将军夫人被德国人请去，要她借此义愤之情发表一番攻击苏联的说辞。然而，将军夫人拒绝了，哪怕在被威胁将她女儿送去集中营的情况下，亦是断然离去。这其中的坚持，怕是可作为当下的表率。

然而，瓦依达片中最为震撼的人心的镜头，还是非片尾的大屠杀莫属。尽管，早就清楚死亡将如约而至，可是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颤抖了。当推土机在卡特森林里挖出巨大的土坑，当黑皮车将一车又一车的波兰军官陆续送来，当那分工明晰合作无间的杀人流程毫发毕现地呈现在你面前，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呼应着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 年）中描述，而其背后所隐藏着的推论，更是令人不寒而栗。卡特惨案在这一瞬间和奥斯威辛站到了一起，一同拷问着我们当下社会的伦理与它的合法性。我们真的可以让类似的惨案不再重演么？

对于一个历经苦难的波兰人而言，哪怕是这样的拷问亦是不够的。无论是那些死于卡特森林的军官，还是他们的家人最希望得到的恐怕还是灵魂上的安息与抚慰。于是我们看到瓦依达将最后一个镜头留给了那即将被土掩埋的由一直年轻的手紧紧握住的十字架，将他所有悲伤的情感都留给了在黑屏中想起的安魂曲。而我，终究无法想象，这会是怎样的一种救赎。

作为一个年逾 80 的导演，瓦依达的成名作拍摄于上世纪 50 年代。由他执导的战争三部曲——《一代人》，《下水道》，《灰烬与钻石》——生动地再现了战时以及战后波兰所面临的复杂局势与民众的艰难生活。也许是由于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即便是在这样早期的作品里，瓦依达所关注的对象就已经是时代大背景下，个人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与成长。于是，你才会看到在《一代人》中年轻人面对革命时的那种激动与迷茫，看到《灰烬与钻石》里抵抗组织的杀手会因为爱上美丽的酒吧女郎开始考虑金盆洗手，回归平常生活。观彼及己，即使是生活在当下，我们却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抉择；而这，也正是瓦依达功力之所在。



出于对《密阳》的不满意，我进而回溯到李沧东之前的《绿洲》，以及再早的《薄荷糖》，终于发现自己的最爱竟是他的成名作《薄荷糖》。和瓦依达类似，李沧东也是一名将镜头视角投向底层生活的导演，某种程度上，他的关注点甚至比瓦依达更边缘。同时，与瓦依达不同的是，李沧东大量地使用客观镜头，习惯性地让自己处于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这使得他的镜头显得更加冷静，直接，锐利。而这亦相应地提高了对电影中演员的要求——他们必须更加费力地通过语言和肢体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像范桑特可以直接地用近焦镜头刻画 Alex 的迷茫（见《迷幻公园》）。幸运的是，在演员的层面上，李沧东似乎从来不缺良将。全度研正是凭借《密阳》一片中近乎歇斯底里的表演在嘎纳封后，而文素利在《绿洲》里对瘫痪女的饰演更是让我瞠目结舌。可是，也正是因为缺乏主观镜头对心理进行刻画，使得影片中的一些情感铺垫不够，而演员的表演虽然足够到位，却也强烈到冲散了整个电影的主线。坦白的说，全度研在《密阳》中的表演是不能令我信服的，倒是文素利成功地在《绿洲》的高潮处引出了那压抑已久的绝望感。但是，她出彩的表演依然是让人精力有所分散。



相比之下,《薄荷糖》里的表演显得更为自然,再加上其特有的倒叙的方式,使得电影中叙事的线条十分清晰。影片抽丝剥茧一般,一步步展示出一个人是怎样被造就,亦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如何被摧毁。主人公年轻时所遭受的心理创伤给他性格以及生活带来的改变,以及在大时代背景下面对冲击的无能为力,也都在李沧东的镜头下一一展现。人的成长转变和时代的变迁紧密的粘在了一起。尽管我们可以肯定是光州事件摧毁了主人公仅存的善良与纯洁,可以肯定是亚洲金融危机让他在最后一败涂地。可是,我们依然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将在怎样的程度上被历史所造就?

我是怎样被造就的?那些满腔热情的爱国者又是怎样被造就的?这些都是难以简单作答的问题。而近期大热的《柯洛佛档案》则不啻在问:“DV 至死”这样的精神又是如何被造就的?作为一个曾被其海报“欺骗”,误以为是怪兽大片的“受害者”,我在此特别友情提醒:这其实是一部全程用 DV 镜头拍摄的有趣的片子;在里面你也许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特别是你并不介意有这样一台既抗摔又能自卫,并且电力几乎无限持久的 DV 的话。

追念·贾植芳、柏杨、查尔斯·蒂利

先生远去 “人”字长存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鸰 (上海, luosiling_china@163.com)

4月24日18点45分,作家、翻译家、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因病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2岁。

第二天,复旦校园内的林荫道旁悬挂起百余只千纸鹤,寄托着学生们对先生的祝福和承诺:先生背影远去,后辈愤然前行。复旦大学第九宿舍楼贾植芳先生家里,书房里,还散着许多来不及翻阅的报纸和杂志,有些杂乱的书橱中,《鲁迅全集》和《胡风全集》显得十分抢眼。

“坑洼的生活道路上,活得像一个人”

贾植芳的朋友胡风,曾有诗赞他:“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晚年,贾植芳对自己评判道:“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

他多次拒绝买办商人伯父为他安排的商贾兴家之路,听从灵魂召唤,投身社会,追寻自己的理想,从逃亡日本到弃学归国,从上尉日文干事到“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从“七月派”骨干作家到大学教授再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几乎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先后四次入狱,“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

1936年,二十出头的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首次入狱,以“共产党嫌疑犯”的身份,尝了将近3个月铁窗滋味,罪名是“危害民国”,其伯父赶到北京,花了一千元银洋和五十两鸦片烟把他“保”出来,随即将他送往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投身抗日,1945年在徐州搞策反,被关进日伪的牢房,这一次他在监狱呆了3个月,直到日本投降。之后,贾植芳来到上海,下火车时口袋里只有8分钱,他雇三轮车来到胡风家,让胡风垫付了车钱。他暂居在胡风家,开始了“正式下海卖文”的生活,投身于当时的进步运动。1947年,全国爆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上海的地下学联办的《学生新报》请贾植芳写文章,他写了《给战斗者》,引起当局的注意,他又一次进了监狱,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关了一年半。在狱中,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企图使他屈服,但他坚持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胡风。

1955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其对胡风的看法,他却一口咬定自己是胡风的朋友。当晚,贾植芳就被带进了看守所。此后,他死不改口,并吟诗明志,“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为此,他经受了整整11年的牢狱之灾,接着又被批斗了近13年,“25年不见



天日的时光，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为了整个国家，我应该回来，应该站出来说话。我的朋友没有做错，他是个好人，我不能出卖他”。

对于这段苦难生活，贾植芳在《狱里狱外》一文中回忆道：“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各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而对于自己传奇而多难的一生，他说：“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灭。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进退有致真猛士，谈笑自若一鸿儒”

在留学日本时，贾植芳曾做过这样一道考试题：“你最崇拜谁？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他的回答是：“我崇拜我自己。”正是这种自信，让瘦小的贾植芳无所畏惧，一切磨难视若等闲。

他非常得意自己的第一次入狱，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更让他得意的是，在狱中他争取到政治犯的伙食——四个花卷，砸饭碗砸得惊动了“蒋委员长”。也正是这种乐观，伴他度过了最屈辱的 25 年：他出席自己的批斗会，同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贾植芳！”平时他很节省，但“每次被批斗后，我反而要到江湾买三两土烧酒、二两猪头肉犒赏自己。”在监禁和劳改的日子里，一向瘦弱的贾植芳反而变得更壮实，走起路来挺着胸脯，迈着坚定的步子，像个正常人。一次，他打着赤膊推着板车，刚好遇上一群刚开完会的昔日同事，他坦然而过，不觉丝毫尴尬。

在学者吴福辉眼里，贾先生既是“仰天无愧怍”“进退有致真猛士”，也是“开口皆胡卢”“谈笑自若一鸿儒”，风趣幽默、乐观积极。而在学生眼里，贾先生更是一位亦师亦父的智慧老人。

1980 年平反后，贾植芳恢复教职，立即投入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的工作中，组建了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他简陋的居所成了所有学生的“家”，一杯茶、一支烟，老人与学生侃侃而谈，风骨必现。络绎而来的学生们恭称他“贾教授”，他说：“我这个教授是假（贾）的，不过，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

在《文化老人话人生》中，贾植芳这样写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其后代提供一些比见之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为此，他始终坚持写日记，记下每天做的事及所思所想，一直到去世前 6 天。在他复出二十多年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老人乐观背后的严肃思考，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弟子们的成长足迹。在去世前一天，他依然牵挂着纪念胡风诞辰 100 周年会议文集的出版，以及朱锡侯生前留下的口述回忆录的整理情况，甚至还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学生说：“等我病好了，欢迎你们到家里来做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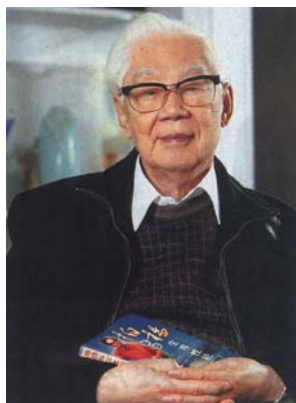
一生乐观豁达的贾植芳曾两次在众人面前失态，两次都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有关。一次是 1985 年 6 月，在八宝山的胡风遗体告别仪式上，70 多岁的他当众嚎啕大哭；一次是 2002 年 11 月，在妻子任敏的追悼会上，他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遗像一声声喊：“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如今，他将与他们在天堂重逢。

“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进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这是悬挂在吊唁厅内的主挽联，逝者长已矣，生者思难尽……

政治犯的监狱比较学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4 月 24 日，贾植芳先生在上海逝世；4 月 29 日，柏杨先生在台北逝世。两位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几乎把牢底坐穿。我曾经在博客中介绍贾植芳的监狱比较学，他一生坐过四次监狱，最后承认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我坐监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看守的可以给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最后那次坐监狱，不能买也不能送。开饭的时候我挑稀饭，可以多吃一点，中午饭都是菜皮烂饭，筷子都挑不起来”。



《柏杨回忆录》也有关于监狱的记载，大概国民党吸取了在大陆的失败教训，到了台湾之后，监狱残酷程度迅速提高到兽行水准。一位《新生报》女记者被全身剥光，架在麻绳上走来走去，走到第三趟只能表示愿意招供，她请调查员暂时离开，允许她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她迅速上吊，后来被宣布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这个不算让我吃惊，我对人性的阴暗向来不会低估。让我吃惊、也让柏杨吃惊的是，1978年《读书人杂志》社长宴请陈映真夫妇，想了解一下政治犯监狱的情形，陈映真表示：“我们坐牢的朋友，一个个都有高水准政治素养，相亲相爱，互相扶持，沮丧时，大家唱歌鼓舞士气，都是亲密的伙伴。”这让在座的年轻朋友非常钦佩，从监狱获释不久的柏杨却难以认同，因为他所经历的与此完全相反。“但陈映真讲时，却是那样的诚恳温馨，仿佛一篇动人的革命小说”，柏杨如此评价。

在翻译米奇尼克的时候，我被仁慈的波兰监狱吓了一跳，米奇尼克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忠诚声明上签字以换得释放：“如果哪天清晨你被猛烈的敲门声吵醒，也不用害怕那些身穿制服的来客，那只是风趣的狱卒在分发早晨的咖啡。”米奇尼克不是陈映真，无意于把监狱的生活浪漫化，他通过这种玩笑暗示整个国家都像监狱一样，如果你出狱，“你将看到的不再是监狱大院，而是布满巡逻军队和滚动坦克的家乡街道。你还将看到人们被拦下、要求出示身份证，汽车停在一边接受行李检查，安全机构人员用他挑剔的眼光扫视人群、试图辨别出‘违背国家战争法’的嫌疑犯。”相比之下，住在监狱岂不是安心很多？

不过，我相信波兰的监狱可能真有咖啡。记得小学语文课本讲到列宁住在沙皇政府的彼得堡监狱里，把分给他吃的黑面包捏成“小瓶”，把牛奶盛在里面，蘸着写文件传单。那时最羡慕的就是列宁的监狱，觉得根本不用寻找天堂，天堂就是监狱啊！课文交待牛奶是列宁母亲送进去的，但黑面包应该是监狱提供的，真是人道极了！

我还曾在网上读过一本《韩国四总统合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在监狱住过多年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参观了曼德拉被关押过的监狱，对他的监狱条件感到羡慕，因为这里比韩国的监牢人道多了。看来在监狱比较学中，东亚具有绝对优势，足以让政治犯闻风丧胆，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柏杨：《柏杨回忆录》，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查尔斯·蒂利

特约撰稿人 羽良（北京，priestliu@gmail.com）

2008年4月16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因其在“社会运动、抗议政治以及现代国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艾伯特·赫希曼奖。仅仅半个月后，4月29日，蒂利因淋巴癌病逝于纽约布朗克斯，享年78岁。

蒂利早年的研究集中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问题的重点在于，欧洲国家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结果，以及为什么几乎所有幸存下来的传统国家最终都选择了民族国家的形式。蒂利的研究结论指出，民族国家这种形式之所以最终胜过所有其他国家组织形式，根本在于民族国家能够有效的汲取、动员国家内的各项资源，保证其在国家间的竞争（绝大多数时间是以战争的形式竞争）中不被彻底打败。

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同时进行的，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蒂利发现，传统国家为了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进而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的间接统治转向中央集权化的直接统治。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于是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内部社会各个阶层也通过向抗议性的集体行动和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重新缔结着社会契约，并由此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雏形。



以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为切入点，蒂利敏锐的注意到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抗议政治的重大意义。传统的涂尔干社会学将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的抗议政治归结为社会失范，并试图将此类社会现象解释为社会的瓦解。蒂利的理论彻底扭转了涂尔干社会学对抗议政治中组织和动员等集体行动逻辑的漠视和敷衍解释。蒂利的研究表明，是组织的瓦解而非社会的瓦解，促进了罢工等集体行动的出现。进而，蒂利认为以组织和动员为核心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化的非抗议政治同样是推动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蒂利重构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宪政道路的非制度政治的一面。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知识语境中，法国大革命代表着革命乌托邦的血腥和进一步退两步式的专制复辟，而英国的宪政道路则代表着一条相对平和、稳健的渐进式路径。但在还原了法国道路和英国道路的历史情境后，蒂利的研究则表明，法国大革命留给法国国家的不仅仅是雅阁宾式的血腥和拿破仑的篡权，还有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选举和代议制等一系列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直接统治方式。从而一扫路易王朝时代的封建弊病，为法国搭好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同样的，英国看似摒弃了暴力革命的发展路径其实远非一路坦途。虽然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础，社会却依旧存在着持久“权利斗争”。这种斗争导致了19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工人阶级运动史，英国的工人阶级通过集会、游行等抗议政治的典型方式，最终促成了英国普选权的扩大和工党的壮大。成为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先驱。

蒂利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别具一格的研究，极大的拓展了人们对社会运动等非制度政治的理解和认识。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对抗议政治的偏见，更重要的是，蒂利指出了抗议政治背后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力。回顾过去三十年来社会运动网络藉全球化之力的迅速扩展，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以非暴力政治为基调的抗议政治几乎成为左右一国转型的决定性力量。蒂利对抗议政治丰富的研究成果，就更值得后来者关注、学习。

书评·文学

我跑，故我在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先破题。《当谈论关于跑的时候我所谈的》（以下简称《当》），无论日文原文，还是译成中文，都是一个拗口的书名。村上春树一向以重视作品的标题著称，从《挪威的森林》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从《海边的卡夫卡》到《舞！舞！舞！》，无不极尽洗练、小资之能事。可如此村上，何以为自己的第一部自传性随笔集起了这样一个缺乏梦幻情调且稍嫌冗长的书名呢？答案是有所师承：向为村上所敬重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弗（Raymond Carver）的短篇集《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乃始作俑者。两年前，村上将其译成日文出版，书名就叫《当谈论关于爱的时候我们所谈的》。

开宗明义，村上戏仿格言警句的口吻说，正如“真正的绅士，不谈关于分手的女人和支付了的话题”似的，“真正的绅士，不在人前津津乐道健康法。”所以一方面，“虽然我不是真正的绅士……但对于写这样的书，依然感到有些难为情”；另一方面，这毕竟“不是一本关于健康法的书”，“我并没有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展开诸如‘好，大家每天跑一跑，让我们更加健康’的主张。它只关涉对像我这样的人说，不停地跑意味着什么，对这件事的思考或自问自答”。

英国作家毛姆尝言，“无论怎样的剃须刀，都有其哲学。”对此，村上颇有心得：“即使再闷的事，只要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便会有某种观照油然而生。”至此，长跑这件谁都做得的庸常俗务，似乎被赋予了类似西西弗斯式的哲学、思辨意味，令人联想起好莱坞电影《阿甘正传》中，退伍军人阿甘领跑众生的故事。但村上不是退伍大兵，他是职业小说家；其性格也不适合领跑，他只是自个跑，一味地、带有些偏执地跑，跑，跑——一直跑下去。“一本关于跑的忠实记录，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于我自己的忠实记录——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这点。”因此，这是一本“以跑步（Running）的行为为基轴的回忆录”。在此，村上特意使用了法文语境的回忆录（mémoire）的表达，令人想到普鲁斯特、莫洛亚等所代表的法兰西内

心独白式自传体回忆的写作传统。

事实上,《当》正是一部路跑者的内心独白。1982 年秋天,33 岁的村上刚刚杀青《寻羊冒险记》,踌躇满志,决定把经营多年的酒吧交给太太,走职业小说家的道路。与此同时,东京都的公路、河畔和自卫队基地的操场上,多了一名长跑者。两件看似无关的事体在时间轴上的响应,既是机缘巧合,也是一个隐喻,在村上而言,则几乎意味着同一件事:写作即长跑,一场永无终点、注定绵延一生的马拉松。

村上的自我定位是以长篇创作为主的小说家,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每年一部的稳定状态,至今不见收敛迹象。“写作长篇的劳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肉体劳动。作文本身大约是脑力劳动,但从头到尾完成一部体系化的书的写作,更近乎肉体劳动。……坐在桌前,神经像激光束似的聚焦于一点,从乌有的地平线上启动自身的想象,构架故事,从庞大的语汇中一个一个地挑选恰如其分的表达,让所有的情节按故事本身应有的逻辑轨道发展、流动……小说家须身披‘物语’的行头(Outfit),全身心投入思考。这种作业所要求作家的,是对全部肉体能力一网打尽般的行使——更多的情况是酷使”。

从音乐酒吧的店主,到职业小说家,意味着两种迥异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跨越,村上所直面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原来,在开店的繁复体力劳动中,体重反而被控制在较低的安全水平。而一旦成“坐家”,日复一日对着稿纸,体力开始下滑,体重增加。为了集中精力,过量吸烟。村上一度日吸烟超过 60 支,乃至手指泛黄,浑身散发烟草味,与“小资教父”的形象有莫大的反差。于是,长跑成了村上志业选择的伴生物。

从那以后,四分之一世纪如一日,村上一直“在路上”:从东京到北海道,从雅典卫城到马拉松镇,从波士顿剑桥城的查尔斯河畔到科罗拉多落基山脉的博尔德高地;从一个人适性随意地跑,到马拉松,到 100 公里超长马拉松,一直到铁人全能三项——小说家对自身体能极限的挑战也挑战着挑战本身的极限。但就在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撞到终点线的那一刻,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某种因挑战而拓宽的空间感、释放感,对小说家来说是最丰饶的恩赐,是创意的源泉。

对此,村上并不讳言自己成名后绝大多数作品的灵感,大都产生于路上,是路跑之人的视觉、感官对河川、山麓和笔直的跑道发生交感的结果。

然而,困惑也在这里。古往今来,文学从来是“恶之花”,而诗人、小说家则是孕育黑暗的花朵的母体。太多的作家论、创作谈告诉我们成功的作家是如何颓废、堕落、糜烂,病态到坠入欲望的最底层,然后置死地而后生,超越罪恶,笔下汨汨流出“恶之花”,从巴尔扎克、狄更斯、菲斯杰拉德,到太宰治、永井荷风、郁达夫,莫不如是。

但村上认为,“所谓艺术行为,就其成立的过程而言,本身就包含不健全的、反社会性的要素……但我觉得,惟其小说写作是人的内在毒素被抽出的‘不健康作业’,要想职业性地、长久地将小说创作进行到底的话,我们务需构筑自身的足以对抗体内危险(有时甚至会要人的命)毒素的免疫系统。只有如此,才能把更强的毒素加以正确、高效的处理。”“操作真正不健康的东西,人要越健康越好——此乃我的辩证法。就是说,不健全的灵魂,也需要健全的肉体。”可以说,这种关于毒素与抗体、有病的灵魂与健康的躯体的辩证法,正是村上文学论的精髓所在,与传统的作家创作谈相比,显得有些另类,却令人耳目一新。

村上甚至为自己提前拟好了墓志铭:

村上春树

作家、路跑者

1949—20××年

至少到最后都不是走着的

一个如此偏执于跑的小说家,直到今天,还在路上——“我跑,故我在”。

村上春树:《当谈论关于跑的时候我所谈的》(『走ることについて語るときに僕の語ること』),[日]文艺春秋社,2007 年 10 月。

书评·文化

陈之藩与胡适的故人旧事

特约撰稿人 严飞 (香港, fei.yan@green.oxon.org)

陈之藩虽然是物理学家、哲学博士,散文却也很有名,出过散文集多种,以小书居多。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时写的《旅美小简》;在曼菲斯教书时写的《在春风里》;在英国剑桥大学时写的《剑河倒影》;在香港前后写的《一星如月》;在台湾及波士顿大学所写的《时空之海》等。据说台湾的中学生没有人不知道陈之藩的,因为他的《谢天》、《失根的兰花》等多篇散文,长期被收录在台湾国文教科书中,早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是多年来启蒙年轻学子对文学世界想象的必读文章。

余光中曾经在散文《尺素寸心》里说,陈之藩年轻时,求知若渴,频和胡适、沈从文、金岳霖等学者书信往还,甚至因此一度被梁实秋戏称为 Man of Letters (书信之人)。而这种求知的欲望,脱离不开时代的大环境。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动乱的年代中,青年人,特别是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青年们,所遭遇到的思想上的困厄和彷徨,往往无处寻求解答,只能自己在摸索中前进。有的人就此热衷于谈“交心的小组会”,有的人“以快乐来适应苦闷的潮流”,还有的人,譬如陈之藩,则主动去认识周遭世界的形态,提出心中的困惑和煎熬,并记录下来,向当世的学者请教。

《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诞生。该书收录了 1947 年至 1948 年陈之藩写给胡适的十三封信。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而陈之藩则是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三、四年级的学生。1947 年的 8 月,胡适做了一次广播讲演,题目为《眼前文化的动向》,并在演讲中提出了人生的三个目标,一是用科学成果解除人生苦痛,二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水准,三是用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来解放思想,完成独立人格。在听完了次广播之后,年轻的陈之藩产生了“几件疑问和一点感想”,遂提笔写了封长信向胡适请教,并根据胡适所论述的三大目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书中收录的这封信残缺不完,完整版本“不知是什么原因,总之是丢了”)。

这封长信虽然未有得到胡适的直接回复,却在他随后于全国四十多家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应走的方向》一文中,作为听者就其演讲的回应专门摘引了出来。陈之藩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提笔又给胡适写了第二封信(1948 年 2 月 28 日),在信的开头剖白道:“我曾给你写了一篇万言书,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竟那么勇敢,又那么可笑,我当时的思想搅成一团,写出来自然是乱七八糟。以这种文章来搅你严肃工作的时间,我事后都感觉有些惭愧,而且有些忏悔。”紧接着,陈之藩自陈道:“我愿意提起勇气来说出我这半年来思想上的演变。在这里,我愿再写给思想的医师,好在一条乱丝中找一条道路”。

这一次,胡适很快就回复了陈之藩,并在信中告诫,青年一代认识眼前的世界需要培养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我很高兴地读你半年来思想的经过。我很佩服你能保存一颗虚而能受的心,那是一切知识思想进步的源头。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胡适在信中提出,“‘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这两句话,“真是医治武断与幼稚病的一剂圣药”(此信写于 1948 年 3 月 3 日,并未有收录在此书中,但部分文句可在陈之藩的信中见到。按照胡适自述,“我那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应走的方向》,是答你的信”)。

1948 年 3 月 17 日,陈之藩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将“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这八个字,譬喻为“如慷慨苍凉的节拍奏在生命秋天的柔曲上”。陈之藩由是盼望胡适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刻“集中精力给国人治病”:青年人行为的固执病、执政者的派系病、国人的懒惰病与姑息病、世人的盲从病、思想上的虚弱病。他认为“治病救人”才是胡适这位思想导师当前着手救国的唯一途径,他也深深感叹:胡适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这样一个过渡时代,“任务太艰巨了!”

就这样一来二去,陈之藩开始了他与胡适之间的通信,并从此成为胡适的忘年小友。两人书信的内容,由读书时的趣事,到国家的前途兴亡,以至“形而上学”的哲学话题,无所不谈,字里行间之中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无奈,以及一名后辈与大学者之间的相知相惜之情。作者在写于 2003 年 7 月的此书后记里回忆道:“彼此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他几乎每信都覆我,有时很短,有时也相当长……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因为与我的同班,几乎无话可谈”。

在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是胡适的回信给年轻的陈之藩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影响和思想上的升华,“当罗曼·罗兰读到了托翁的信后,而决定了他毕生的路程;而甘地读过了托翁的信因而发扬了旷古未达的道德力量。我这样的比拟是太不自量的,这只是说明你的教育对我的影响的剧烈(1948 年 3 月 6 日)”,“一个年轻的人去理解一个通博哲者的心,岂不是如一个孩子看着湖面的影子去理解湖水一样(1948 年 3 月 17 日)”,“在报纸上看过先生的演讲,心中是一种不能形容的快



活。一种刺人的光芒，使人在暗中感到振奋（1948年6月7日）。”因此作者在后记中有这样的形容：“与胡适之先生的故事有很多，零零散散的写在我的散文里。算是朋友吗？又不是太谈得来；不是朋友吗？他实际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和胡适通了几次信之后，陈之藩曾到当时的北平东厂胡同和胡适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是1948年的夏天，他穿着短裤就去了，刚刚聊了一会，时任北京大学训导长的贺麟来了，要跟胡适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于是只好匆匆结束谈话，告辞离去”，改日再寻拜访。当时陈之藩即届毕业，北洋大学屡次发函催其接受学校的派遣，前往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不负责任，不明道义，训练了四年当用时却走了”。当时身处北京的陈之藩虽然“心中挤满了话，要跟先生说”，但又不能不肩负学子报国的道义，只能启程踏上南下台湾的邮轮，继续以书信形式和胡适保持联系。

“给您写信，大概也有瘾，您也不必回我，因为我不吐不快”（陈之藩语）、“千万写信给我，你的信总是最欢迎的，是我最爱读的”（胡适语）。陈之藩与胡适的故人旧事，就在这一封封书信的来鸿去雁中越酿越醇厚。难怪也常与陈之藩有通信的董桥曾经总结过，当代深刻认识胡适其人者是他晚年的秘书胡颂平，深刻认识胡适学术思想者是余英时，而深刻认识胡适性情和趣味者，则是陈之藩了。后来胡适1962年在台湾逝世的时候，远在美国任教的陈之藩含泪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动情地回忆：“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那个时候的陈之藩最为悲痛的，大概就是自己无论写多少的信，那位1947年夏天给北洋大学电机系一名初生牛犊的年轻学子起笔回信的胡适先生，已经无法再读到了。

陈之藩：《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书评·思想

世俗时代的信仰

特约撰稿人 马庆（上海，maqing_1976@yahoo.com.cn）



最近，哈佛大学出版了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新作《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这位被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称为当今最重要的十数位哲学家之一的加拿大学者，一向以反思现代性文化与社会之重大转变而闻名于世，并在年初获得了2007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由慈善家约翰·坦普尔顿爵士设立于30年前的坦普尔顿奖，旨在鼓励科学和宗教对话，以比诺贝尔奖更高的奖金额著称，特雷莎修女和索尔仁尼琴也在前度获奖者之列。而这本《世俗时代》也展现了泰勒对现代性种种问题的最新思考。此书一出，好评叠至。同样以反思现代性著称的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称赞此书为过去一百多年的讨论提供了原创性贡献，并不无叹息地说，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书了。另一位哲学家贝拉（Robert N. Bellah）甚至想把此书称为他一生中读过的最重要的一本书。《The Economist》称，每一位对人类社会发

展有些许兴趣的人，都可以在此书中发现大量的真知灼见。《Kirkus Reviews》也赞叹，泰勒可以把复杂的哲学术语转化为所有读者都明白的语言，却丝毫不损害其精妙之处。

对于世俗时代，人们往往会理解为宗教的退场。不过，泰勒提醒我们注意，这种习见的看法中其实包含着几层相当不同的意蕴。第一种意思是从公共领域来理解世俗时代。在今天的各种诸如政治、经济、教育之类社会活动中，我们所依照的规范，我们所权衡的程序都完全不需要诉诸任何上帝或宗教信仰的考虑。第二种意思则是说，世俗化意味着现代世界中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衰亡。人们不再去教堂，也不再信教。世俗时代还有第三种含义，它是指信仰地位的改变。上帝已经从一个不容置疑的信仰，转为一个普通的、与他者相等的观点。在今天，宗教并不是真的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而是我们早已习惯把各种观点，宗教的、非宗教的、有神论的、无神论的，并列混杂地加以考量。在这个意义上，世俗时代意味着我们理解事物的整个语境发生了变化。

很多宗教信仰者和世俗主义者都认为，基督教文化与世俗主义是彼此不相容的。比如人们常说，要么追求精神，要么享受生活，没有中间道路。而泰勒指出，现代的世俗文化既包含着对基督福音的发展，对道成肉身生活方式的体现，又包含着

对福音的否定，对上帝的摒弃。现代文化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基督教世界的结构和信仰，一方面又比传统基督教世界更进一步体现了基督教生活某些面向。例如，现代自由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对普遍人权的肯定。肯定人具有生存权、自由权、公民权以及自我实现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即无需依赖其性别、文化特性、文明程度或宗教信仰。而这种无条件正是基督教所追求的无条件之爱。从历史上看，对无条件人权的追求常常从对基督教义的追求中获得动力。所以，现代文化不仅与基督教有着历史渊源，而且可能比以往的基督教世界更好地体现了基督教义的某些方面。

当然，泰勒也承认，宗教信仰在历史上往往造成危害。他并不希望、更不提倡我们回到早期的基督教形式。虽然他本人是一个诚信的天主教徒，但在泰勒看来，具体的宗教模式其实无关宏旨。对于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从小长在双语氛围中（母亲家里说法语，父亲家里说英语）的泰勒来说，多元身份或者说以多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身份（identity）早已根深蒂固。他在牛津读书时所亲近的导师，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同样是游走于多个文化之间的人物。他们都认可现代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自然也不会赞成某个一元性的宗教模式。不过，泰勒也相信，人没有信仰是无法生活的，因为人的生存与活动都需要意义的引导。意义来自于人的自我解释，这些解释背后就涉及到泰勒所说的“道德源头（moral source）”，而宗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资源。

熟悉泰勒的人知道，对于世俗时代的现代社会，他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他 1989 年的杰作《自我之源》（*Source of the Self*）中，泰勒表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呈现出一种难以接受的两难困境：或者投身于那些令人爱恨交加的传统宗教形态；或者委身于那种压抑精神生活的世俗主义。在结尾处，泰勒写到，“抛开历史上所有的宗教因素或基本的希望，而采取一种彻头彻尾的世俗观点，并不是一种解决两难困境的做法，尽管它可能是身处两难困境中的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不能避免两难，因为这也关乎到它自身的‘残损（mutilation）’。它关乎到扼杀了我们回应那些人类所知的最深刻最强劲的精神追求。”如今的泰勒似乎更为积极，试图以现代意义下的宗教精神来走出这种两难困境，所以他会尝试地讨论也许存在“一种天主教的现代性（A Catholic Modernity）？”。不过，泰勒也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叙述往往是很西方化的，他提出“多样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y）”的主张，反对一种模式下的现代性，尤其是套用西方模式的现代性。既然如此，作为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面对现代性的两难困境，我们又该做何选择？这也许是《世俗时代》最让我们思考的地方。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September 20, 200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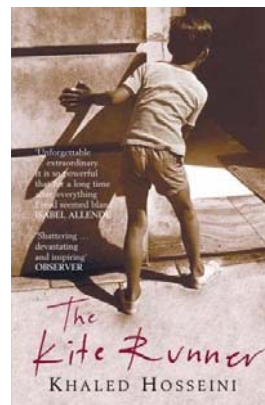
随笔

伦敦书展：阿拉伯文学唱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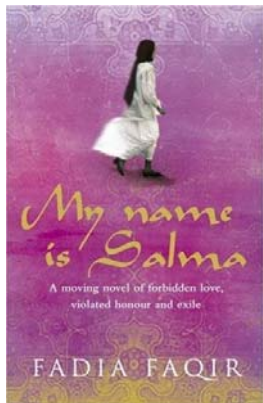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英国·谢菲尔德，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用这句滥俗的谚语来形容已落下帷幕的伦敦书展再合适不过。唯一可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除了延续上届的地利之便——从远离市区的 ExCel 中心搬回西部的伯爵府（Earls Court）展览中心举办，阿拉伯文学成为了本届书展的市场热点。在为期三天的书展中，来自阿联酋、黎巴嫩、阿曼、沙特阿拉伯等 22 个阿拉伯语国家和地区的多名作家、代理商和出版从业人士通过讲座、研讨等形式向西方出版界介绍阿拉伯的当代文学。

如果说“911”和伊拉克战争让文静的美国人意识到了截然不同的中东文化，那么阿富汗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小说《追风筝的孩子》则使已经被美式文化惯坏的西方读者意识到阿拉伯文学的存在。英国去年对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文学市场的出口额高达九千万英镑，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用本次书展的国际发展部经理的艾玛·豪斯（Emma House）的话来说，“出版商们都知道，阿拉伯文学一直都是一块未被开垦的，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处女地。”以色列作家在前月举行的巴黎书展所获得的成功给了参展商们更足的信心询问：阿拉伯的作家们能否可以通过这次伦敦书展拷贝“巴黎模式”呢？



需要说明的是,与其它任何书展一样,伦敦书展与其说是关于文学和出版的,不如说是关于商业和利润的。书展闭幕当天,北美第六大的出版机构托马斯·纳尔逊放出话来,说它们不准备参加接下来即将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和明年的伦敦书展。不仅如此,它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就退出了“美洲图书博览会”(BEA),理由是在书展方面的市场投入并没有为投资者带来预期的回报,不少出版商都在考虑节缩开支。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海特在发布会上解释说,“当前的经济低迷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每一美元的市场营销价值。”在英国首相布朗和文化大臣霍奇森来力挺书展的时候,却是接二连三的“退展”传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书展的形式在西方业界内已经逐渐褪去了早先强烈的吸引力。相反,倒是来自东欧、西亚的国家在近年的展览中表现更为抢眼。



40 余名阿拉伯作家受英国文化协会邀请参加今年的书展,可谓历年之最,其中包括埃及作家阿斯旺尼、卡勒德·阿尔卡米西,沙特青年作家内贾·阿尔萨尼等等。通常人们一提到阿拉伯文学就会联想到针对拉什迪、赛阿达薇等作家的文化恐怖主义事件,另外,阿拉伯的当代作家们也普遍希望改变西方对阿拉伯文学过于笼统的解读。例如,在爱情或侦探题材小说中,读者总是期待读到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传统妇女角色,而约旦裔英国作家法蒂娅·法琪尔(Fadia Faqir)最近出版的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我名叫萨尔玛》(My Name is Salma)中,主人公则是一个不带面纱的、敢于追求爱情的少女,处世方式完全逆传统而行之。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我只希望被读者理解为独立的个人,而不是打上标签的阿拉伯人。

然而,在文学理想的背后是资本昂贵的运作。近年,阿布扎比政府投入资金设立了“阿拉伯国际小说奖”等一系列高额文学奖金,体现了其打造全球化语境下强势的阿拉伯文化的意图。与此同时,阿联酋还专门拨出一部分国库资金设立了一个叫做“卡利玛”(阿拉伯语“文字”之意)的翻译计划,即从今年开始,每年从西方引进一百本名著,移译为阿拉伯语。笔者匆匆浏览了一下首批书单,其中既有像史蒂芬·霍金、劳伦斯·怀特这些畅销作家的作品,更多地包括了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哈贝马斯《人性的未来》等较为艰深的理论著作,充分印证了醉翁之意在于文化。

除了舍得大把花钱以外,耗时耗财的跨洋展会的市场吸引力也是驱动阿拉伯国家大举率团前来的重要原因。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之一,阿拉伯文学直到1988年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才真正进入英国和西方的视野。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整个阿拉伯语地区书籍的年均翻译率只有50本。至今,翻译仍然是制约阿拉伯文学影响力的障碍。如果不是汉弗莱·戴维斯高质量的翻译,《亚库比恩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根本不可能进入英国人的阅读范围,更不要说在小说改编为电影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更高声誉。上一届的扎耶德总统奖颁给英籍阿拉伯语翻译家约翰·戴维斯说明了官方也开始意识到翻译对文学市场的决定性。

阿拉伯的生意人们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将本国文学打造得颇有声势,其间除了政府的助澜也少不了经济上的精打细算。从上世纪60年代第一本阿拉伯短篇小说集在英国的艰难出版,到现在对欧美图书市场的大举进攻,阿拉伯文学在美元贬值的日子却越发显示出坚挺之势。英国方面需要阿拉伯为书展攒人气,而阿拉伯文学则希望借此机会打开国际市场。在这种双赢的博弈下,读者或许会成为最终的受益人。

影像

小城里的歌声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原定在2008年立春上映的《立春》,却因一场冬雪而推迟至今。而在上海各院线的上映,也是草草收场,《立春》对于今天的人们,只是一个历史的故事,但是它却清理着一代人的青春经验,这种经验,对于下一代的青年而言,不仅陌生,或许还会心生不屑,毕竟这样的怀念与当下“向前看”的时代精神,已是格格不入。

《立春》讲述的是一位身居小城但却热爱歌剧的女音乐教师的故事,她容貌丑陋,但却因为喜欢歌剧而与小城难以融为一体,她不断地撒谎,仿佛她随时都可以离开小城,调入北京。因为她了解,她的尊严只是维系在“中央歌剧院”这样的符号上,歌剧本身,并不足以让她得到小城的认可。

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城中，一位喜欢画画但却永远考不上中央美院的黄四宝，还有一位对王彩玲充满幻想的艺术男青年周瑜，构成了王彩玲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在互相唏嘘中温暖对方，却因各怀心思却又在不断的互相伤害。

影片开幕，滚滚的自行车流，广播里播放着王彩玲演唱的 *Frühlingsglaube*（慕春），灰色的人群掺杂些许亮色，正是那个时代的某种象征。尽管影片中颇多今日看来较为滑稽的场景，比如当年年轻女性争为时尚的健美裤，开放初期小城里时兴的简陋 KTV 等等，都能引起观众的一些戏谑的笑声。但是许多场景却又让人未免有些伤感，那阴沉楼房背景下所点缀出来的一丝鲜艳的服装亮色，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对自由的冲动。它的背后，却隐然存在着一栋高墙，灰色、冷漠，如同王彩玲歌唱时的观众，被黄四宝羞辱时背后那栋阴灰的教学楼、那些围观的人们。



小城与古典艺术在那个转型时代里的相遇，培养出无数的王彩玲、黄四宝与周瑜。在几十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西方古典艺术被“红色经典”所取代。而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大潮澎湃而至时，西方古典音乐、哲学通过收音机、“灰皮书”甚至手抄本席卷全国。小城的年轻人，开始知道海德格尔、普契尼还有梵高。那是一个文化饥渴与朝圣的年代，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西方的文化，也是一扇赋予个体生命意义的窗，尽管他们当时并不知晓，对于哲学、歌剧还有绘画的狂热会在 10 余年后迅速退潮，由消费主义取而代之。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曾经无意识的见证过一些“王彩玲”或者她的变形版本。也曾经有机会去跟从一位当地的音乐老师学习声乐，那位老师曾在省里得过大奖。那时候心目中的她，神秘而备受崇敬。我的家庭与她家有着良好的私交，但是她后来意外的溺水，却让我断绝了一条学习声乐的道路。个人经历而言，无所谓好坏，也无法重来。但是每当在影片中看到王彩玲弹琴歌唱，我就回想起那年在那位音乐老师家的情景，琴盖打开着，上面一本乐谱。那是一个小城中少有的艺术世界，而我曾经在它的门口擦身而过。

自然，那个时代，那座小城，没人关心她唱的是什麼，无论是普契尼还是舒伯特，能让她维持尊严的，要么是她的家庭，要么是 she 所获得的艺术荣誉。但是人们所喜欢议论的，却常常是她婚姻的危机和离婚后的种种琐事。她是否对这样一种处境有所不平，有所愤懑，我不得而知。内地小城里艺术，总是呈现出极端的悖谬感，高雅却又不断经受着流俗的侵袭，最终让她们要么拉平成和大家一模一样，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不再构成差异性的挑战，不再成为“一根鱼刺”，要么就永远的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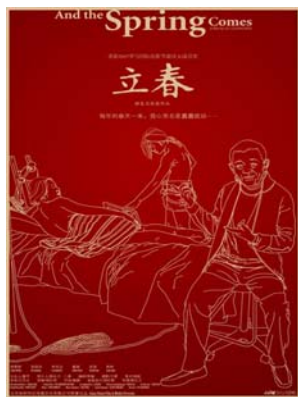
顾长卫镜头里的小城，总是与梦想产生着强烈的冲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王彩玲同样也被都市冷酷的拒绝。她无数次的赶往北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一个北京户口，调入中央歌剧院。但是她却一再的受挫，艺术于她而言，不仅是点燃生命意义的一盏灯，而且也是她在世俗世界的解脱之道，因此她一次次的依靠歌剧来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但是却又一次次地想籍此打开一扇通往北京的大门，精神上的自尊与现实生活中的卑微身份之间的冲突无疑让她纠葛于心，难以解脱。

时至今日，还能常常在内地的许多城市里遭遇到曾经的“文学青年”、“思想青年”以及“艺术青年”，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残留下来的幸存者。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对文学、思想、艺术疯狂不已，甚至认为找到了解答生命意义的密钥，但是他们的理想主义却逐渐与知识生产体制以及 1990 年代以降泛滥的消费主义之间却越来越不相容。幸运者进入学院机制，忝列教授之列，要么投笔从商，也成为转型期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更多些如王彩玲这样的人，虽有理想主义情怀，但却不得不与这个大的时代氛围转变所抗争，甚至要为自己的尊严而苦苦挣扎。个中滋味，或许只有当事人冷暖自知。

但是王彩玲又无处可逃，尽管她一直梦想逃离小城，但是她所要进入的那个艺术生产机制，仍然是国家体制化权力的一环而已，艺术并非最高的评判标准，在这个体制中，没有艺术，只有依靠权力所区隔的一个个文化等级。而且在那个市场经济刚刚萌生的年代，如同那位冷冷的办公室主任所说，没有编制、没有演出机会，艺术已然是一片荒芜，就算“为了艺术”又如何？

但是，在那个灰暗的小城，同样是艺术青年的黄四宝，也一次次的经受着无法考上美院的折磨，梵高是艺术的目标，但是他却无法承担梵高割耳疯癫的代价。他需要中央美院赋予他一个体制的身份，认为由此就可以登上最高的艺术殿堂。他和王彩玲互相唏嘘，互相温暖，共同梦想着坐上一趟开往巴黎的列车，但就在一夜酒醉后的亲密关系之后，黄四宝当众羞辱了容貌丑陋的王彩玲，也粉碎了王彩玲在这座小城里唯一的温暖。艺术理想已然破碎，“为了爱情”最终也是一地荒芜。

而另外一位执着于芭蕾的胡金泉，则是一位同性恋。同样都是小城里的异类，艺术让他和王彩玲惺惺惜惺惺，但是他最终无法抵御住“身为异端”所遭受的压力，而是选择了入狱来逃离小城的生活，在冰冷的铁栅栏后，他的“脚尖旋地”依然优雅，但是却是以极端的方式来换取的凄厉之美。尽管这一段颇有《孔雀》中那超现实主义降落伞的影子，但是却表达更为自然，无论是降落伞还是监狱里的芭蕾舞，都代表着一种对小城流俗的反叛，但是前者更显得是像一场青春期的想象，后者却更能契合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因为对于有过内地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在那些地方，对公众的反叛需要付出的，或许是我们有时都无法想象的残酷代价。



在将那位欺骗她的高贝贝成功的送上了中央电视台后，王彩玲本来以为，艺术理想最终以生命的代价得以实现，这个换算过程虽然艰辛，但是对艺术毕竟算是一个慰藉，毕竟这仍然符合“有志者事竟成”的逻辑。对于王彩玲而言，歌剧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却不想，这背后却仍然是一场依靠关系网络搭建的成功之路，高贝贝拿着王海玲准备换取北京户口的钱打通了成名路。这条道路对于王彩玲而言却是失败的，而那位小女孩却成功了。不幸与幸，不在天赋，不在努力，不在对艺术的渴望，有时候只是处于生命的偶然和个人的幸运。对于王彩玲而言，最为残酷与绝望的并非是对她欺骗，而是她开始清醒的了解到艺术的“真相”乃是一场人为的游戏，差别只是有人能够借此成功，有人无可避免的将被淘汰掉。

这种遭遇与情结尽管在那一特定的时代发生，但是在今天，内地的青年人如潮水般涌入大都市，只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尽管这些梦想已经不再与思想、艺术有关，但是他们最终也会自问，理想一旦破灭，我们将何以自处？是沉沦？还是与残酷的世界和解？

顾长卫是毕竟是温情的，他没有像《站台》一样，让曾经对外面的世界蠢蠢欲动的崔明亮最终麻木的看着窗外黑黝黝的城市，王彩玲收养了一位嘴唇畸形的小女孩，还成功了进行了治疗。她那位中风的老父亲，看着院子里的小家庭，眼神温暖而感人。影片的结尾，母女二人，依旧是在天安门广场，王彩玲没有像以前那样呆看着城楼，憧憬着艺术的梦想，而是深情的看着女儿。于她而言，艺术最终是一场未实现的梦想，是一次不甘于平庸的人生实践。

她放弃了艺术理想，因为对于那套艺术权力的生产机制，她毫无办法。一面是婚姻爱情的“美色”逻辑，一面是艺术背后的“权力”逻辑，要么缺乏先天条件，要么是屡试屡败，最终头碰血流。她的热情与尊严，来自于音乐，但是她却要不断的与小城压抑的气氛不断抗争，耗尽了青春的激情。

但是导演顾长卫最终毕竟给了她一个家庭，在天伦之乐的围绕下，婚姻、艺术都开始消退，王彩玲开始与自己和解。或许她已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命运，而家庭与孩子，是她最后的避风港。在这点上，贾樟柯的《站台》更为阴暗，家庭、孩子最终只是一个人生轮回的机械过程，麻木、冷漠构成了家庭生活的基调。《立春》的结尾是温暖与明亮的，这是两位导演对人生的理解，尽管他们所描述的，都是那同样一个时代，同样的一个内地。

革命——没有电视转播

特约撰稿人：张 昕（美国·洛杉矶 xinzhang999@gmail.com）

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场革命的过程为现代影像技术所完全记录——当年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众所周知是事后“摆拍”、再创作的结果——而手头这部纪录片应该算是对一场革命的“最亲密接触”了。

一个爱尔兰纪录片摄影队自 2001 年下半年开始在委内瑞拉拍摄关于总统查韦斯的新闻纪录片，因此因缘际会地亲眼目睹并记录下 2002 年 4 月 11 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生的那场针对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以及此后查韦斯支持者如何粉碎政变的全过程。

他们镜头记录下的是一系列的利益集团——委内瑞拉国内的上层阶级、石油大亨、媒体巨头、军队中的右翼势力、加上美国政府（国务院、中情局）——联合起来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了 1999 年民选上台的查韦斯。后者自上台之后一系列颇为激进的民粹主义政策严重打击了前者的既得利益。这些反对查韦斯的力量在政变之前已经通过自己所控制的私营媒体不断打击和妖魔化查韦斯和他的支持者，而在政变过程中更把撤消查韦斯控制的唯一的国有电视台（电视 8 台）当作保证政变



成功的重要保证，以便控制对于政变的解释权。而该纪录片的创作者正是希望以“在场者”身份把自己所掌握的政变细节传递出来，揭穿政变集团掌控的媒体渠道中制造的种种谎言，更希望揭示此后那场真正民众自发革命的意义。

编导对查韦斯的基本态度从影片开始就一清二楚：他就是占委内瑞拉人口 80% 的中下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虽然影片着墨不多，但观众应该会对政变前查韦斯开展的“玻利瓦尔任务”产生亲近感：大规模的教育卫生运动、再分配石油收入、空前活跃的草根民主组织、查韦斯著名的《你好，总统》电视叩应节目，还有查韦斯本人独特的行事风格 and 与底层民众的交流方式。

该纪录片最出彩的自然是在政变发生当晚摄影队在查韦斯总统府内捕捉到的众多细节。政变当晚面对反对派轰炸总统府的最后通牒，自愿留在总统府陪同查韦斯的同僚和支持者们相互拥抱、以“人民不会同意”这样的话相互鼓励，完全是作好以死抗争的准备。而当查韦斯最终决定向政变方交出自己之后，眼中含泪的众人在掌声和歌声中护送查韦斯出门的——那歌声让我想起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那首动人的《驼铃》。

而政变中的另一方，那个常常被称为委内瑞拉 20% 人口的代表则被纪录片以各种方式刻画成拙劣的政治小丑。政变前委内瑞拉 5 家私营电视台不断散播的针对查韦斯的种种谣言——包括他和卡斯特罗之间所谓的特殊的性关系——已经让人感觉恶心。在把民选总统赶下台的短短不到两天时间里，政变上台的右翼政府不仅迅速解散国民议会和司法体系，取消电视 8 台，更对走上街头的查韦斯支持者严加打压，全然没有所谓民主派的风范。

在这些以反革命形象出现的查韦斯对手中最具讽刺意味的莫过于那位政变政府的总检察长。在政变之后新政府的成立大会上，西装革履、器宇轩昂的新科总长在高台上大声宣读新政府废除查韦斯内阁成员和众多政策的决定，每雄壮地读出一句撤消决定后得到的就是台下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然而，不到 48 小时之后当查韦斯重新掌权之时，他和其他政变政府的成员被关押在总统府地下室里。畏缩在墙角里的这位老兄只剩下满眼的迷茫和恐慌，俨然是一副“落水狗”的卖相，而此时总统府外则是查韦斯支持者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小时候革命传统题材电影中所反复渲染的众多革命者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故事如今在地球另一边一个陌生国度里更加戏剧性地重现，不同的是现在我所看到的是难得的现场纪实。

虽然重新夺回对总统府的控制、重新开启电视 8 台、并最终把查韦斯迎回总统府的是忠于查韦斯的总统卫队和武装部队，但是导演的镜头很清楚地告诉观众：查韦斯真正的政治基础是那些在政变之后走上街头愤怒地挥舞国旗、对着镜头高喊“我们要查韦斯回来”的支持者、是那些在总统府铁门前面对政变军队坦克死命踢打铁门、抗议政变的普通群众。在编导眼中，帮助查韦斯重新掌权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自发的革命：虽然戏剧性的高潮部分持续不过 48 小时，但这场革命背后能量积蓄的过程远不是这 48 小时能够涵盖的。

“在现场”的感觉虽然让影片充满了难得一见的幕后细节，却也注定了这部 74 分钟的纪录片不可能给出太多的历史背景和对政变深层原因的分析。即便在基本的事实层面，这部在发行之后获得 12 项各类影展奖项的纪录片也引起众多争议。4 月 11 日政变发生前查韦斯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街头对峙中究竟是谁开了第一枪从而引发反对派的政变决定，影片给出的结论受到多方质疑。而在政变中查韦斯是否正式辞去过总统职务各方也有不同说辞。

求证事实真相超越出我个人的能力，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政变之后的委内瑞拉政治：在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关于革命、反全球化、反新殖民主义、反寡头政治的口号之后，在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玻利瓦尔任务”背后，“革命后”的难题在委内瑞拉如何解决？

根据影片的记录，在政变发生前的委内瑞拉，查韦斯对私有媒体的容忍程度令人吃惊。但是，关注委内瑞拉政局的人都知道最近两年查韦斯已经在不断收紧对媒体的控制，最出名的例子是 2006 年他取消了委内瑞拉第二大电视频道的经营执照。而 2007 年底由查韦斯提出的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也以 51% 的反对票被否决，查韦斯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围绕宪法修正案的冲突同样曾发展到暴力对抗的程度。查韦斯和他的支持者用来支持这些“革命后”政策动议的重要依据就是 2002 年的那场政变：国内外的敌人和反动势力亡我之心昭然若揭，为此革命者完全可以、也必须在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宪法民主之上发展出自己的体制，保卫和延续革命的成果。

由此引发的问题已经超越委内瑞拉。当查韦斯支持者的批评矛头不断指向华盛顿的时候，我们恐怕也不可否认：2002 年加拉加斯街头的枪声和鲜血又何尝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到“敌我矛盾”的结果——那只可能来自华盛顿的黑手最多不过是推波助澜了一把。如果查韦斯确实是那 80% 的委内瑞拉公民利益的代表，另外那 20% 公民的利益如何处理？莫非真

的要发展到将后者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才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宪政”能否消融暴风骤雨似的阶级冲突？还是一切最终只能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最终只能由枪杆子来决定胜败？

“人民创造了历史”——查韦斯跟解救自己的军官拥抱时提到这句老话。人民还将继续创造历史。希望下一场革命发生时，我能有幸看到现场直播。

纪录片：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又名 Chavez: Inside the Coup)

导演：Kim Bartley, Donnacha O'Briain

发行时间：2003 年 语言：英语 / 西班牙语

该片可以在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IHPPpL9z9GE) 上观看（西班牙语部分有英语字幕）<http://www.youtube.com/watch?v=IHPPpL9z9GE>

影片官方网站：<http://www.chavezthefilm.com/html/home.htm>

谎言重复一千遍还是谎言

特约撰稿人 汪伟（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周老虎”的老虎皮一层层地被热心的网民剥下来之后，怀疑的目光没有止于这只苍白的死老虎，而是投向了活蹦乱跳的“刘羚羊”。和出自不谙器材的猎人周正龙之手的虎照不同，藏羚羊的照片是专业人士制造的，还得到来自传媒业内的表彰。照片出笼的时候被当作是难得一见的好新闻，但终于被网民证明，它和“周老虎”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假货。

两件事的结局各异，然而同样不堪，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视觉谎言的世界上。很多人都忧心忡忡，认为数码时代的新闻照片太容易作假，因此不再值得信任。事实又如何呢？

photoshop 这样的软件确实使造假变得更加容易了。也常常听说某某新闻照片是“PS”的产物。2006 年 8 月，路透社的摄影师阿德南·哈吉就被爆 PS 过两张新闻照片。虽然摄影师立刻被勒令卷铺盖走人，但路透社这样的名门正派都贞节不保，难怪有些人会想，自从进入了数码时代，假照片就流毒天下，以至于把“真实”做为目标的新闻摄影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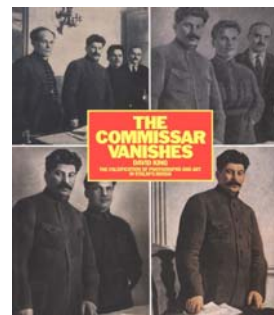
这种想法有一个流行但是根本错误的前提。在假货横行的中国，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会不会造假取决于造假的难易程度。但事实上，技术从来不是决定产品真假的关键。一个行业会不会假货横行，并不取决于造假的难易，甚至不取决于这个行业的道德水准，而是取决于制度是否能够有力地约束造假行为。

有一件事情大家不大了解。在胶片摄影的时代，造假要比使用 photoshop 难上那么一点点，但假照片同样比比皆是——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多——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米兰·昆德拉曾经讲过一个故事：1948 年 2 月，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哥特瓦尔德的同志们簇拥在他周围，而紧靠在他身边的就是克莱门蒂斯。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而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戈特瓦尔德的头上。宣传部门复制了成千上万份戈特瓦尔德站在阳台上向人民发表演说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皮帽，周围是他的同志们。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历史上消失了，并且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克莱门蒂斯的命运是对摄影领域内“真实”两个字的讽刺，而这样的讽刺，又何其多哉。有人甚至专门出过一本书，讲前苏联的宣传部门如何根据形势需要，修改政治人物的合影。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消失的人民委员》，亚马逊网站上还有卖。

看过这样的书，知道在暗房时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知道，造假的关键绝不在技术的难易。如果制度暗示、鼓励或者强迫摄影师篡改、编造和说谎，不管技术上有多难，都会有人迎难而上。如果造假就意味着自绝前途，不管造假多么容易，摄影师都会有操守得多。



如果说胶片时代和数码时代有区别,有没有互联网或许是最大的区别。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改头换面甚至大变活人……但凡 photoshop 今天干过的事情,都有人在暗房里面干过。没有互联网,普通人不了解其中的奥妙,而知道其中奥妙的人,又不能让自己的意见周知。假照片不被揭露出来,就不会有公众的抗议,没有抗议,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谎言就没有顾忌,就敢于重复——谎言重复一千遍仍然是谎言,但上当受骗的人会多很多。暗房与 photoshop 的区别,小节而已。

因此,技术的进步带给读者的,毋宁说是福利。用过电脑的人要远远多于进过暗房的人,有利于我们保持警惕。有一些看上去很神奇的视觉效果,比如说藏羚羊在火车经过的时候列队穿过铁路桥,很容易就会引起怀疑(装糊涂除外)。如果是胶片时代,除了少数了解暗房的专家,一般大众也许就在一阵咋舌惊叹之后,把照片上的情景当作和谐社会的祥瑞之兆,信服并且四处传播开去了。

讲演

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晚期威权主义(修订版)

特约撰稿人: 吴强 (德国·杜伊斯堡, qiangwu.de@googlemail.com)

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国内有一个政治思潮就是新权威主义,大家都不愿意说是新威权主义,更愿意用一个似乎比较温和的概念——新权威主义——来替当时的改革找到一条政治改革的方向。虽然新权威主义在 1989 年之后表面上销声匿迹了,但是在随后的改革和发展当中,事实上成为 1990 年代的政治实践主流。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尤其是当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威权政体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在变化,中国也从传统的很多方面具备极权主义特征的高度威权政体,走向自由经济的新的一种威权主义。只是,威权主义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面目、性质、方向,在过去没有人能够搞得清楚。在过去十五年以来,特别是当现在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到底怎么去定义它、理解它、定性它?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一看,中国威权主义的发展。



我要介绍的中国的社会运动,实际上指的是 2003 年,以孙志刚事件为代表的新的维权运动的兴起。在 2003 年之后有很多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反对司法不公正的种种的具体的行动。比如说对劳教制度等,特别是当时孙志刚事件直接引发的,要求废除收容制度的运动;以及我们看到农民工维权运动的兴起,官方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

还有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业主维权的运动,目前业主维权正在走向一种联合。我们还看到环保运动,在 2003 年也开始兴起。在这之前中国的很多环保组织,并不是以环保运动的方式在运作,恰恰是 2003 年之后的维权运动把环保组织也卷入进来。然后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有抗争性的环保的具体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环保运动出现了。

所有这些运动,吉登斯在概括七十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四个象限的划分,是公民权三分法的一个继续。T.H.马歇尔在 1949 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对公民权的发展做了一个线性的公民权利发展的三阶段演变的历史概括,也就是说从公民的基本权利到 19 世纪政治权利的发展,通常我们说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工会的合法化,以及罢工的合法化,到二十世纪初普选权的获得,一种政治权利的获得,然后到了 20 世纪一种以社会权利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吉登斯在他 1976 年的社会学里又加了一条,生态权利或者说是道德运动。中国的维权运动,他们的诉求和诉求过程,也可以做一个划分,基本上对应于公民权利四象限,以权利为诉求的核心。比如像业主维权运动,它是在这种产权为基础上派生出来的。

2003 年前后,所有卷入到社会威权主义当中的组织,我们可以分成五类,这五类的结构关系,可以有这么一个圈形大致表示出来,实际上是具体的社会网络构成的,我把它忽略掉了,只是以它的规模,以及它的重叠关系来代表这么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的结构,代表社会运动组织的大致的一个状态。

最左边,为数最多的是从 1998 年兴起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自发协会,这是非政治的组织。在上方是环保的非政治组织,

它成立得最早,大概是1994年,这是最早发展的中国非政治组织,其实很多这些环境保护的组织,在漫长的非政治化的九十年代,他们没有卷入任何的社会运动,只是做环境的教育等等,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单位,但是在社会运动兴起之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社会运动的参与方式。

最下面的是我们说的维权团体,这么一个民权组织,涵盖目前正在发展的各色的专业的各类维权团体,其实不少这种维权团体在九十年代也已经萌发,只是数量比较少,也很早就被国际研究人员重视。包括当时很多女工权益的团体,劳工权益的团体,在九十年代都已经产生,在九十年代末、21世纪初这部分团体成长非常迅速,超过了环保团体的规模。

最右边的这一块是国际非政治组织,中国发展简报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大概有200到250家国际非政治组织在中国活动。国际非政治组织的进入最早是从1991年华东水灾开始进入,对中国非政治组织的影响非常巨大。他们长期保持跟政治的远离,以及跟政府的一种合作关系。在九十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国际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是居于中国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核心,但是目前从社会运动角度来看,它的这种核心地位被取代。在社会运动组织网络的中心,我们现在发现存在着一些新的知识分子组织,包括一些早期的从九十年代就成立的,在2003年前后,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知识分子团体,这些知识分子团体代替了国际非政府组织渐渐成为社会运动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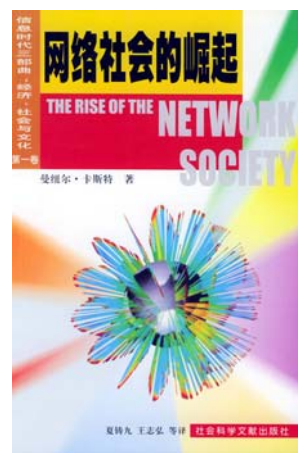
社会运动的概念是一种非体制政治。在中国这种非体制政治就意味着一种政治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它是对私人生活的政治化,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这叫社会运动。最近二十年的研究,广义上来讲甚至可以把社会运动追溯到19世纪的无产阶级运动或者说工人运动,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经典的社会运动,跟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出现的新社会运动相区别,在这之前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运动等等社会主义的运动,他们的对抗性是比较强烈的,跟政府的冲突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恰恰是他们的抗争,赢得了19世纪的普遍的公民权,帮助了19世纪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建立跟这种抗争运动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一种传统的经典的社会运动,在议会政治之外的普通民众发起来的。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这种社会运动更多的是以工作场合,以工作和经济为基础生长起来的,以工会为团结的核心,以工作的场合作为一个动员的方式。那么到了20世纪战后,社会权利也实现了,这个时候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它的抗争性没有那么强烈,他们争取的更多的是在认同基础上的,一种相对于资本主义对个人生活的殖民化,即哈贝马斯所说的。在经济、生活和权利都发展之后,个人生活被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殖民化了,这时候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也就是托洛茨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崩溃论不再现实”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社会运动,要求对这种生活的殖民化作出一种反抗,来寻求各种的自由、关怀,对环境、核问题,包括同性恋的自我的认同等等,新社会运动在20世纪的60年代之后,随着学生运动而兴起。

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Rheingold在1992年发现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生成次影响,首先是虚拟共同体的形成,1995年他提出一个概念叫聪明的暴民,2005年他总结出来一种社会运动新的演变,“从电脑屏幕到街上去”,从虚拟网络进入的真实的街头的抗争。1998年的菲律宾埃斯特拉达总统的下台,就是这一转变的结果。菲律宾民众用手机和互联网的方式聚集起来,在街头把总统推翻了。这么一个结构化,以互联网为基础、为结构、为网络的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它涉及到三个方面,从认同到网络化到事件。

认同,比较容易理解。关于信息时代的网络化,Castells提出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也就是说从对抗性的、反对性的认同,转向项目性的认同,等等。中国社会运动的兴起恰恰也是有这么一个转变,从八十年代要求民主,到九十年代当权利意识开始进入,特别是1998年前后两个人权公约的签订之后,转向一种更理性化、更建设化的一种公民权利的建设,这种公民权的建设是要求实现宪法所保障的、追求宪法权利的运动,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具体的追求的过程,不是追求一种比较抽象的民主价值,而是追求一种非常具体的权利。同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共同体的形成,把计算机网络变成一种社会网络,比如像李希光在2004年做过的研究,他对天涯的网络沙龙的研究,注意到以互联网论坛为基础结社。

我们看到刚才那张图,就是这个结构,以互联网和论坛为基础的一种结社的出现,这里有很多的联系和具体的行动,因为互联网成为可能,利用互联网建立起来一种社会的联系,进行运动的动员。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传播的过程。那么它的结果,有各种事件,各种抗争事件,它既是结果也是一种过程。刚才我们说的孙志刚事件,在这之前更多的是偶然性事件,都以这种偶然性事件,结构化得以展开,运动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



Luhmann 在 1998 年就去世了，换句话说他没有看到计算机、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深刻影响。大家我们现在反过来看他当时非常抽象的社会理论，即使他去世得早，但是也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网络、传播和行动的关系。他有一个重要的论断，事件是社会系统的构成单位。那么假设这个社会系统存在一个事件的网络，并且能够自我生产的话，这个系统实际上就是再生产的过程，我们说这个系统是一个自耦合的系统。

不过，我们今天关心的自耦合的系统出现在生活领域，出现在生活世界。传统上对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两分法，我们可以追溯到胡塞尔，胡塞尔之后哈贝马斯对这个概念的传播贡献很大，他把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划分，是他的基本的理论方法，一个两分法。但是，社会运动作为自耦合系统的结果，恰恰是出现在生活领域、生活系统，换句话说生活世界变成一个独立的系统，相对于环境更复杂的系统，它的核心就是抗争政治，通过网络、组织、个人，通过刚才说的很多社会运动组织的一种去制度化（相对环境系统）的一个过程。中国的社会组织去制度化有很多方面，比如说非政府组织，不是按一种非政府组织的方式来登记，反而很多是一种商业组织的形态存在。还包括我们说的互联网为基础的结社，都是一种非政府组织，都是一种去制度化的存在，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风险。

在这么一个外部结构，也就是结构化所谈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的相互作用之下，出现了一个以权利、以维权为认同、和中心诉求的这么一个自组织的过程，而且这个自组织是因为它的网络、因为它的各种事件，自我再增强，这样的结果、这样一个过程，就称其为一个自耦合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所谓社会政治对体制政治的影响。我们刚才讲到了两分法，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划分，对应于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划分。传统意义上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分开的，政治社会指的是议会为代表的一个体制政治，而公民社会为代表的是一种，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一个自我管理。传统上这两个世界、两个社会是分离的，或者说每次选举的时候才发生关系。这是传统的一个公民社会的概念，传统的政治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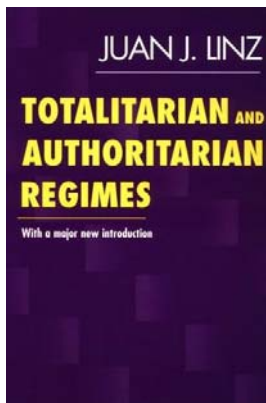
但是社会运动，是一种非体制政治，在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相互的穿透，打破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界限。当然这只是一理想类型，我们在中国谈的不是市民社会，谈的只是中国的大众，这个时候我们要理解谈的就是大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这么一个社会政治的兴起，我们刚才说基于很多具体的权利，这种权利本来应该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些权利构不成一种市民社会，比如说基本的财产权，基本的人身权，公民社会才有可能。中国恰恰是在这些权利的追求基础上，形成了这么一个生成中的市民社会，这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社会学的概念，市民社会具备的市民社会特征只是一种暂时性特征，并不具备市民社会的充分条件。我刚才说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本来是市民社会的前提，但中国在不具备的前提下，为了这种权利去追求或者说去维护的时候，它出现的是公民社会的暂时性的特征，这就是我们谈的社会运动的一个结果，它的网络、它的边界，认同的边界，以及它的组织的边界，最后它通过各种抗争的事件，完成了一种再生产，形成一种生成中的一个市民社会。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威权主义它是有弹性的，经济是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它是爱国主义，严格地讲不能说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爱国主义，换句话说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现在采取一种，从 1992 年开始鼓励所谓这种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但是在这之后经历了很多反复，曾经在 1998、1999 年做过非常严厉的清洗和整顿，在 1998 年的二十万的社会团体在 1999 年变成了 13 万。在这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官方对于这些自我组织，也是采取了弹性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地镇压，至少工商局也知道了这些组织的意义，所以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然后跟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存在相当多的官方的合作，这个时候合作的关系是非常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它是保持着弹性，甚至提出一种新合作主义来形容这样一种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发展。

也就是说威权主义还是有灵活性和弹性的，这是我们理解晚期威权主义的两分法，二元论的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兴起的社会运动，它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强权的一种国家与普通大众，而不是与个人的一种联系，它以权利诉求的中心形成一种新的认同，就是公民的认同，我们说的一种去附性的认同。

这样一种认同，一种新的认同，世相对于原来依附性的认同。所谓依附性认同，指的是依附于政党、组织、宗族、任何传统的血缘的这样一种认同，但是公民意味着普遍的权利，脱离跟党、跟单位人的联系，形成一种抽象的认同。我们说维权运动最大的结果是形成一种新的公民意识，它一种去附性认同。这个时候它对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要求，是国家与个人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和大众的关系。而且我们看各种运动，它的诉求的指向，以及它的历史的发展，它是一种反威权的性质。

这么一种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尽管威权要持续下去，但是它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晚期的威权主义，而且在相当长的未来将保持下去。这就威权的持续性，它来自于全球化，换句话说这种威权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就像民主，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能够输出民主。我们都明白全球化的受益者是所谓的民主的输出，但是同时全球化在后期，或者



说在反恐，在 9.11 之后，我们看到威权主义的复活和输出。这种输出可能是以原材料的交换和对威权体制的维持作为一个对价。我们知道冷战时代，Linz 和 Stepan 对政权形态做过四种划分：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苏丹主义和民主的。在冷战结束之后，在全球化进行了十几年之后，特别是反恐战争打响之后，反恐战争的最大的受害者，是苏丹主义作为一种统治政权的消灭，留下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这两个政体按照卢曼的理论来讲，包括在座各位理解的马克思辩证法来讲，是互为依赖、互为存在的。这就像中国所输出的威权的对象，存在一种原材料和威权体制的一种互相的交换和依赖的话，那么以中国晚期威权主义为核心的威权阵营跟所谓的民主阵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高度的互相依赖和互相的穿透，互相依赖体现在劳动力的交换、商品的交换以及政治利益的交换，特别在反恐战争这种一致目标的协作，事实上在目前的阶段，协作大于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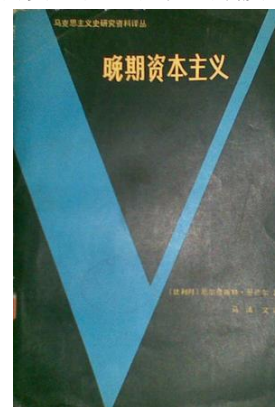
这种新的格局已经形成。比如说中国对苏丹的这么一种经济关系，就被国际社会理解为一种威权主义的输出，类似的例子非常多。同时我们来看，第三波民主化的结果，我们看民主转型的很多国家，他们恰恰出现了很多相反的趋势，也就是各种新威权主义的变种，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概括，如下图。这也例证了两元格局的形成。

- 拉美：Delegative democracy (O' Donnell, 1994);
- 东欧：Defected democracy (Merkel, 2003);
- 拉美、东欧和台湾：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Schedler, 2006);
-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等：Semi-authoritarian regimes (Olcott and Ottaway, 1999);
- 东南亚：Durable authoritarianism (Slater, 2005);
- 中国：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Dickson, 2005).

这个时候要回到基本的政治学的概念，威权是什么？威权指的是很多的统治方式，以一种非制度化的形态存在，所以才称其为威权，表面上它可能有选举，有这些制度化的选举，但是在任何制度化的民主都无法持久，相反被很多非制度化的统治方式，比如说个人的威权，或者说军阀的统治所代替。奥唐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委任民主，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德国的 Merkel 发现民主的缺陷，还有选举威权的存在，选举威权普遍存在于南美、台湾，存在于很多地方。它有民主的选举的框架，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某一方可能会滥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像陈水扁所表现出来的选举威权，这实际上是对民主的一种伤害，一种对威权的偏好，或者是威权主义的遗留。卡内基研究所的 Olcott and Ottaway 1999 年把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归类为一种半威权的一种形态，而这种半威权政权，我们都知道在目前越来越得到强化，尽管他们有表面上民主的架构。2005 年凤凰城有一篇博士论文提出了一个结论，东南亚国家存在持久的威权主义，包括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种类似 19 世纪的威权。像菲律宾尽管有亚洲历史上最久的民主的制度，但是它的民主却是相当的脆弱、相当的局限，相反它的威权相当持久，对生活的影响持续性更为强烈。

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 Dickson，他曾经提出一个著名概念“红色资本家”。在 2005 年，他又提出所谓的民粹威权主义，来形容中国在 21 世纪初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在丰富全球威权主义，但是它的核心仍然是晚期威权主义。换句话说，以中国的例子为例，这种民粹威权主义只是晚期威权主义一个局部、具体的方式。更生成的，如果能对它的过去和未来做一个长期的定性的概括的话，晚期威权主义更为合适。

晚期威权主义这个词我们借鉴于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和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都曾经有非常丰富的论述。他们假设马克思的交换理论，以及私有化与国家行政管理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一种社会革命的发生。但是新的时代这种革命的条件已经失去了，但是资本主义还能够持续下去，为什么呢？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下去的另外一个方面，资本主义被改变了，被欧洲的社会民主给改变了，资本主义变得更温和，更消除阶级差别，它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一种资本主义。恰恰是这种结果上的不平等，资本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建立在这种平等的权利基础上的不平等能够持续下去。



19 世纪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以一种生产关系，再生产来维持这么一个所谓的上层建筑。但是在 20 世纪我们来看，曼德尔所说的一种晚期的资本主义，它恰恰不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更多的平等的基础上来维持一种不平等，也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上。

去年以来有一些例证，可以看到晚期威权主义的一些变化，就是说人们和政府的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威权的持续性。最近发生在拉萨的冲突，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拉萨的冲突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世界和威权世界两者相互的穿透，拉萨的暴力作为一种示威方式属于全球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在拉萨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个阵营的存在。这些例子，都印证了我们所说的这种维权的持续性，在未来可预见的我们的有生之年，都可以预见到这种威权会继续下去，而不是民主化。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我以前看到过一个定义，威权主义是指的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加上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不知道您对这个定义是怎么看的？还有建立在这个定义上，您觉得现在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这种持续发展，对我国现在这种晚期威权主义的形成有什么意义？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您谈的互联网的这个问题，我从自己的感受来说，比如说前两天城管打死魏文华的事件，当时网络上的呼声很强烈，但是到后来往往是一种不了了之的状况，您对于现在互联网在我国政治体制下的这种脆弱，您是怎么看的？

吴强：第一个问题说，所谓的威权是以政治上的集权，市场经济的自由为特征，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定义。政治上恰恰在威权主义存在一定程度的多元主义，也就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比如说阿根廷，在它的威权时代，教会、工会都跟政府存在相当的合作，但是其他的结社是被禁止的，换句话说其他的利益代表是无法进入体制政治的。这个时候政治上存在非常有限的多元主义，有限的多元主义才是威权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在经济上也未必都是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

我们举个例子，在西班牙，在佛朗哥政权的西班牙，经济的管制非常的强大。换句话说就业人口，我记得 70-80%都是由国有经济来控制的。在佛朗哥从 1936 年 1975 年漫长的威权统治期间，市场经济并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国家统制经济。那么在蒋介石时期，市场经济仍然也是，虽然它地域很大，从农村到民营资本，但是仍然是服从于一种统制经济，所以威权不是以所谓市场经济为特色，但是经济自由主义也是相当程度存在。

我们强调威权，我刚才讲主要是强调统治上面的过渡特征，至于在当代，不管是民主政权还是威权政权，我们都可以一种极权主义的倾向，在极权主义的控制方面，因为网络、电脑、CCTV，所谓的这种中央监控电视系统，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监视，一种极权主义的体现，这个是在任何当代的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都出现的一中极权主义倾向，阿伦特当年所忧虑的社会的极权主义化，这个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也仍然区分不了民主化或者非民主的一种政权，这是所有我们应该清楚、应该警惕的。但是它并不是划分威权政体和非威权政体的一个标志。

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是维持了晚期威权的存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好比说全球范围内，全球化，更大范围的市场经济，都是在支撑这种晚期威权的存在。恰恰是因为全球化的存在，才有了晚期威权在全球威权主义里面的核心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把它抽象出来，叫晚期威权，而不叫具体的民粹威权，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一种更普遍性的概念，来形容全球化的结果。

第三个问题是互联网。毫无疑问，在晚期威权体制下，公民的表达自由是受基本的限制的。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技术的发展，一种技术的相互对抗，除此之外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除了通过这种抗争所出现的任何的插曲性的事件，也许一个事件会改变这一切，它这种转型是不可预料的，预料只能通过事件的出现来展现出来，来显现出来。这种结构的改变，只能通过某一个具体的插曲性的事件，随着无法预料的事件来体现出过去发生的一种结构性的转变，并且这种结构性的转变，通过这种事件的发生来转变，这是我们理解晚期威权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事件具有核心地位。

那么一个小的事情也许不足以成为一个有利的事件，或者说转型性的事件。我们不知道这种事件的累积会不会让另外一个偶然的事件，变为一个新的转型的契机。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那么未来在出现类似的不可测的情况，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把它称之为插曲性的转型，这种转型不是用一个路线图的，而是相当程度上通过偶然性事件体现出来。

提问：您讲的市民社会，中国市民社会是比较脆弱的，当然市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不是对国家威权主义构成很大的制约？你讲的威权主义的输出，这是我觉得比较新颖的地方，我以前听过的都是讲，因为在西方的影响下，西方它对民主化的输出，绝对是占一个主导性的地位，中国目前属于一个附属性的阶段，西方的民主的输出，还远远是占支配的压倒性的地位。中国的威权性的输出，我感觉到它在某种程度上没有那种能够吸引人的地方。我感觉西方的民主输出更具有这种普遍性，而威权主义的输出，中国哪怕发展到世界第一，超过美国，它的影响力，它的威权主义也很难起到主导作用，我

不知道您怎么看？您讲到亚洲地区的持久性的威权，我感觉这个跟亚洲的儒家文化，肯定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儒家文化绝对没有什么跟民主有相契合的地方，它没有。儒家的文化强调整体主义，强调服从、等级性。儒家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中国要走民主化的过程，如果通过一个小小的事件，我看也非常渺茫。

吴强：第一点，在晚期威权主义里面，这种生成中的公民社会，恰恰是构成晚期威权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它改变了威权的统治。这是它的基本构成部分，我们谈社会运动，它就形成一个有政治化的，但是生成中的公民社会并没有完全形成，这个叫晚期威权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改变了威权主义的性质。

你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是相冲突的，第三个问题年轻人相信儒家价值观的强大，第二个问题怀疑威权的这种全球的对抗性的下风、弱势。实际上你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相冲突，从文化的持续性，我是完全相信一点。我们现在看到全球威权主义的输出，比如说以孔子学院为代表，它也是一种价值上的输出，也是一种全球威权主义输出的例证，就像你说的全球威权主义，它跟民主在对抗。它通过价值观的输出，把儒家这种跟民主毫无关系的，一种反民主的威权的价值观，向全球输出。现在有钱了，能够支撑得起，在全球建立几百所孔子学院，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中国人现在用这个方式来做。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在这里，这只是一个结果，是一个形态，也是在刚刚在进行，还不足以形成像华约组织和北约组织真正两极的对抗。我们说生成中的公民社会，它是晚期威权主义开始的，但是这种全球威权主义，也是正在输出，正在谋求一种，寻找一种全球威权主义的地盘以及它维持的方式。但是它这种维持的方式，我们发现它也是一种可再生的，也是一种自我生产、自我复制的一种过程，在很多的国家和地方，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功，通过原材料的交换，通过威权政体。原材料交换之后，维持这种威权政体存在。

但是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些问题，我们来理解缅甸、巴基斯坦，我们刚才举了很多全球新威权主义的例子，这些国家，像俄罗斯等，都具有了全民的普选、公民人身权利基本的保障，我们仍然把它归类为威权形态。为什么？尼泊尔昨天才刚刚进行第一次选举，缅甸军政府刚刚宣布过几年也要选举，你就说他是民主国家了吗？不是这样子，也许它的威权会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它不因为这种形式的具备，我们说它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恰恰是在晚期的威权主义和我们所说的美国的民主，所谓代表的两极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的过渡的威权的形态。以及第二世界，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社会民主的欧洲的存在。南欧跟民主的距离更近，在南欧之外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台湾这种新兴的民主化国家和地区，韩国等等等等，都是在向民主化远未得到巩固的一些威权的一种形态在存在着。在这之后还有像缅甸、巴基斯坦等等，土耳其、独联体的很多的国家，他们一个个在步其后尘，在韩国、在台湾之外，在民主和威权的一些基本的制度化方面在争夺。

但是我们要忧虑的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新兴的威权国家，他们的威权本身在制度化。我们知道威权它的统治恰恰是依赖非制度化的一种形态，威权的制度化在现在全球化，以及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刚才这位同学所提到的，科技使集权主义成为一种可能。为什么说中国过去不是集权主义，因为它从来没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实现对个人高度的控制。但是在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了，通过金盾工程，通过 CCTV 普遍架设，现在街道上有很多的 CCTV，以及图像分辨系统。前两天我坐出租车也发现，连出租车上都装了摄像头，在车内副驾驶的座位上，这种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之一，也是能够在有限资金内来实现一种威权的统治，所以也能够支撑这种半威权政体的一种存在。

整个这个过程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已经成熟的对抗，不是，它是互相依赖的，威权和民主是互相依赖的，民主和非民主自古以来是互相依赖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能理解 9•11 的意义，反恐战争的意义就是打掉了第三极。很多阿拉伯国家面临这种选择，你是继续维持威权，往威权方向走，但形式上具有民主的特征，比如苏丹，你要有选举议会，基本的民主程序都要有，但是你保留威权统治，或者就是彻底的民主化，很多阿拉伯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选择，打掉了苏丹传统的统治方式。

北约阵营里，西班牙最近好一些，十年前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威权国家。希腊，这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受益者，可以很大程度上民主化，但是它威权的形态仍然是一定程度的存在，土耳其更是一个典型的威权国家，但是它有常规的选举，正常的民主运作，仍然把它归为一种威权的形态，因为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来理解，它的个人，它的公民，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威权的压迫。它的多元主义是有限的，政党竞争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世界有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当中，我们对类型做了一种划分，晚期威权主义，这样理解后来的世界的格局才有意义。

提问：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谈到中国权威主义的改变，我们可以期望于技术的进步。

吴强：说实话我也很悲观，恰恰威权在利用技术，而不是民主来利用技术，民主也可以把技术用在加强它的威权方面，

就是很坏的倾向。

提问：中国的民主发展，再往生成深层次考虑，是不是还是有待于工业化，形成一种工业化的发展？

吴强：问得非常好，刚才我们最早谈社会运动的纪念的时候，谈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发展的新社会运动，恰恰是一种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基本的富足大家都有了，权利大家都有了，政治参与其实也有了，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子弟，他们还是很不满，走上街头，新社会运动基本上是中产阶级子弟的运动。在中国目前这种政治运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这么一种类型，中国很多维权运动的参与者和发动者，人恰恰也是社会正在形成当中的中产阶级，一种后工业化时代的一种产物。现在后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是一个同时并进的过程，包括中国很多的在社会运动之外的，在维权运动之外的很多的其他的新的社会运动的方式都在成长，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在加速形成这种公民社会。这种影响本身来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改变了维权的性质，改变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但是威权太强大，不是这种形成中的公民社会能够改变得了的，确实是这样。

提问：威权主义最终会发展到哪种结果呢？

吴强：它把原来非制度化的一种统治方式制度化了，这个是目前我们说的，相对于传统的威权主义最重要的区别，所以才叫晚期威权主义，威权主义它在进化。我们经常看电影《异形》，它在进化，进化之后我也不知道。

提问：1936 年的时候，希特勒的时候，西方把它划分为民主的政治制度，这种民主最终没有导致真正的像西方说的那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刚才谈到价值观外交的问题，美国输出它的民主，我听您的理论，注重价值观的因素最根本的还是欧洲，最根本的源泉还是在欧洲。但是美国我们称它是现在非常具有价值观的外交的方式，但是真正美国的对外政策还是基于现实主义，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这块是不是稍微有点软弱，是不是可以借助一些时机，进行适当的对抗？

吴强：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任何研究都是假说和验证，只有假说的有效性和相对有效性的问题，哪一个更有效的问题，也就是范式的转换。我个人倾向于什么样的解释呢？也就是说希特勒的上台是一种社会民主的失败，社会民主失败可以归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民主党人选择跟威廉皇帝的合作，支持建立民族国家。社会民主党人这种错误的策略，也是有其阶级基础的，但是这种选择间接导致了它后来的结果，也就是它所想妥协的这部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手工业者，这些不是社会民主的中坚力量（社会民主的中坚力量是工人阶级，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这部分恰恰是推动希特勒上台的最重要的选票基础，哪怕这个选票最后加起来才 30%多，但是社会民主党自己错误的选择，导致了战后在欧洲大萧条的挫折感，使它丧失了相当多的群众的基础，最后人民把希望给了希特勒，所以这是一种社会民主的失败。那么到了战后，甚至整个二百年的欧洲的历史，它的民主过程，就像我们探讨的社会民主和各种极权倾向的一种较量，包括法国发生的封建王权的较量，这些都是社会民主的进步，它在不断地造就欧洲民主和欧洲人权价值观，这是社会民主的结果。

美国没有社会民主。那么在民主和威权政体之间，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方式呢？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相信它会起到一种融合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威权和民主本来就是互相依赖的，在资本上面是互相依赖的，市场经济也是互相依赖的。但是在民主的方式上，它是否能提供一种比较缓冲的中间的选择呢？也许是可以的，我相信它是可以的。那么这种对抗也许会慢慢融合，更何况这种两极世界并不是一种对抗，只是一种划分，一种区隔，一种资源的争夺、资源的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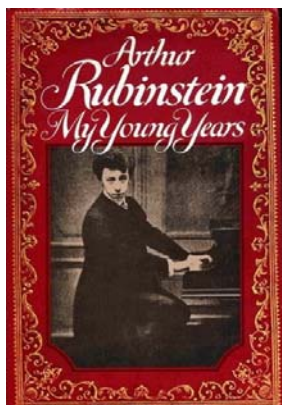
那么它的社会民主的价值观能够走到多远？对两面影响到多远，具体影响到哪些方面，我们还在观察，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欧洲对这个世界可能的改变。

译介

《我的青年时代》：鲁宾斯坦迷人的前奏曲

乔纳森·亚德利 (Jonathan Yardley)

翻译：陈丹丹 (南京, Cheryl@live.cn)



且不论《我的青年时代》从书店中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此书仍是一本风格庄重的经典自传。如今堆满书架的传记，多是由没有明显成就的自恋的叙述者，以自我心理治疗的方式，令人作呕地抱怨着或真实或假想的焦虑。而此书笔法大气，与众不同，引用鲁宾斯坦简洁的前言，它叙述了“我青年时代的斗争、错误、冒险……以及奇迹般的美与幸福”。鲁宾斯坦的一生满载着胜利与挫折，完整而充实。当他八十多岁着手写此书时，声望已相当高，他的故事因而完全值得读者们的关注。

此书用英语写成（英语是鲁宾斯坦熟练掌握的几种语言之一），且写的极好，几乎没有波兰语（他的母语）或鲁宾斯坦年轻时常说的其他几种语言（俄语、德语、法语）的痕迹。我 30 年前首次阅读此书，用的是 1973 年第三次印刷的平装本。那时我热衷于鲁宾斯坦，正一张张地倾听他的肖邦（另一个波兰人）作品录音。对古典音乐我所知不多，但当时（现在也是）的确被鲁宾斯坦对肖邦抒情的诠释所深深吸引。我翻开这本书，单单想了解一下这个创造音乐的人，没想到却被强烈的感染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鲁宾斯坦在前言中还提到：“我从不记日记，即便我有日记，它也会跟其他的东西一起在两次大战中丢掉。但是，我很幸运地拥有不可思议的记忆力，可以追溯漫漫人生的每一天。”这也是阅读此书时应怀抱友好的怀疑态度的原因，尤其是当作者谈及他年轻时无数的情事之时。但是就整体印象来说，此书真实的一面还是多余虚构的成分。毫无疑问，鲁宾斯坦回忆中的许多谈话相当缺乏准确性，但书中的“真实之戒”还是很明朗的。鲁宾斯坦在需要时，愿意以一种混合了骄傲与自谦的笔触，坦率地描绘自己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也加强了本书的真实性。

鲁宾斯坦出生于罗兹一个相对富有的家庭。他年幼时就显露出了音乐天分，并被带到柏林接受著名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的监督。约阿希姆不是作为老师，而是作为忠实的顾问，“亲自承担起指导我音乐和文化教育的任务”。一开始，“约阿希姆教授列出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让我母亲保证，不把我当作神童来推销”，他“坚持认为，在艺术上成熟之前，我应当接受全面的教育。”不过，鲁宾斯坦似乎不是个接受严格监督的学生，而更像个漫无目标的自学成才者。但是，他的确成为了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对各领域的许多问题他都情绪激昂，见解独到。

但鲁宾斯坦可不是一点的懒——他“只会成功地做好那些需要特别努力的事——比如演奏会，或后来的录音”。当他的音乐教育继续进行时，这成为了一个问题。他二十岁后在欧洲声名渐起，并第一次在美国巡回演出，但是他的“保留曲目需要扩大”。他写到：

“两个星期不到，两部重要的贝多芬奏鸣曲，勃拉姆斯和舒曼的短曲，以及肖邦的 B 小调奏鸣曲就被加了进来。同以前，以及会被证实的以后一样，我处理手头音乐的过程和方式是一种奇特的组合：一方面我对作品的结构有清晰的理解，也能完全领会作曲家的意图；另一方面，我又懒得要命，不肯注意细节，不愿练习那些困难的部分，以求得完美、清晰的演出。我曾惯于将所有重量压到对音乐内意指的传递中。”

显然，他懒惰的毛病是受纯然的早慧怂恿而致。钢琴演奏对他来说太自然、太容易了，所以，对于稍逊一筹的钢琴家们不断练习仍然效果不好的段落，他可以用一半的努力就轻松达到目标。而且，尽管他深爱着音乐，他对观众的态度却有些玩世不恭：“我了解到……一场响亮、轰动的演出，即便从音乐角度上讲十分糟糕，也总会得到那些蒙昧的、不懂音乐的观众们热烈的欢迎。我羞愧地承认，在此后的不少演奏会中，我都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认识。”除此之外，他不仅是天生的钢琴家，还是个天生的花花公子。他年纪不大就有风流韵事流传，对象多是年长于他的女士。他又总是擅长社交聚会、台球、扑克，以及持续到凌晨的喧闹欢笑。

坦白说，他有时候很孩子气甚至不负责任。“没有任何节俭的意识——这是我大半生中致命的错误。”而且，他认为用别

人的钱是应得的权利。20 世纪初（他不擅长提供具体日期），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就在巴黎混的穷困潦倒，过着一种“折磨人的生活，始终缺钱，始终欠债。”那段时光“是我所经历的典型生活，每天为生存而努力，又经常从最精致的奢侈品中获得解脱，后来很多年都是如此”。他的许多朋友，以及愿意陪伴他的爱乐者，使他的这种解脱成为可能。

他有时候还完全不知羞耻。某次，他说服一个朋友用一大笔钱帮助他度过难关。朋友同意之后，他立即建议将这笔钱投入到去巴黎、伦敦以及其他地方的奢侈旅行中，这两人后来还真这么做了。不过，他的放纵任性似乎不是因为娇惯，因为他十几岁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就已相当疏远。读到一些段落时，人们会气得想去扭他的脖子，但是他坦白这些年轻时的不幸事件时，是如此直率、大方、自然，所以读书时的气愤也就很快过去了。显然，鲁宾斯坦是非常惹人喜爱的。他的许多朋友都是（或后来成为）音乐圈或艺术圈上的知名人物——卡萨尔斯·亚宾（Fyodor Chaliapin），希马诺夫斯基（Karol Szymanowski），杜卡（Paul Dukas），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贾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但是他叙述这些友谊绝不是为了提高自己身份。这些仅仅是他周游过的圈子而已。

他的青年时光多是消磨在那些富有的，贵族特权家庭所办的沙龙中。与地位崇高却乏味的人相处似乎并不令鲁宾斯坦烦恼——毕竟，这些人在他身上也花销不少——不过也不是全无代价的，就像他在最有趣的故事之一中所说的一样。伟大的波兰爱国钢琴家帕德瑞夫斯基（Ignace Jan Paderewski）有次受邀为一位英国公爵夫人演奏。他“索要了一笔庞大的演出费，并被欣然准许了。”可是后来，“他收到公爵夫人的信，写到：‘亲爱的大师，很遗憾我们不能邀请您参加晚宴。但我们将为专业的艺术家提供舒适的房间，供您在演奏前休息，云云’”Paderewski 回复道：“亲爱的公爵夫人：感谢您的来信。既已获悉不需出席晚宴，一半的费用我即满意……”

这本尽五百页的书中还有许多其他好玩的故事，同时，也渗透着对一战前欧洲的深切怀念，“那是一个轻松的年代，一个繁荣的年代。国与国之间和平交往，人们过着高尚的生活，品味典雅，举止得体。”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丢失的还有此书中浸透的幸福感——鲁宾斯坦写到，他的“幸福的秘密”就是“无条件的热爱生命，不管是好是坏”。书中亦有一种潜伏的悲伤，不仅是对作者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是对所处的世界的悲痛。总之，《我的青年时代》是一本动人的书。遗憾的是，感兴趣的读者不得不在旧书店中和图书馆中翻找，或者在网上购买。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